

康熙皇帝的集字活動——從幾件董其昌（款）〈古詩十九首〉談起

簡欣晨

摘要

董其昌（1555-1636）一生中數度書寫〈古詩十九首〉，其中兩件的受書人可考訂為董氏友人新安方季康（1579-?）、山東許維新（1551-1628）；另有一件為河北南和白氏家族舊藏。其中董其昌贈給方季康的作品今日應仍存世，為冊頁形式，曾為狄學耕（1820-1899）、狄葆賢（1872-1941）父子所有。上海博物館藏有此冊頁本之宋珏（1576-1632）所臨絹本長卷，曾經平湖葛氏三代遞藏，入葛金烺（1837-1890）《愛日吟廬書畫錄》、葛嗣滂（1867-1935）《愛日吟廬書畫補錄》。上海博物館本上有周亮工（1612-1672）假跋、假印，雖偽，但所傳達的資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上海博物館本的定年依程嘉燧（1565-1643）《松圓浪淘集》，可能可限縮至甲寅（1614）左右。

國立故宮博物院亦收藏一件〈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作品材質為金粟山藏經紙，曾遭嚴重拆分，一部份甚至裁割為字字獨立。後歷經兩次重新裝池，第一次由原長卷被拆解後的零散碎片重裱為十開冊頁，但許多紙片位置拼合錯誤，導致畫面佈局怪異，行氣不暢；第二次則將冊頁重新接裱回長卷。故宮本未經拆解前的大致樣貌可見於董其昌姪孫董鎬（主要活動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摹勒的《書種堂續帖》中。但《書種堂續帖》上石時，捨棄今日故宮本上所見「乙卯」（1615）跋，替換為另外一件〈古詩十九首〉的「甲寅」（1614）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有另兩件董其昌書作，分別是〈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亦經嚴重拆分再重裝。前述〈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與〈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曾被考慮收入《石渠寶笈續編》，後被剔除，終入《石渠寶笈三編》。故宮所收藏的此三件作品拆分手法類似，經筆者考察，應為清代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為作集字對臨之用而割裂，可能亦重裝於康熙朝。三件作品上留下大量康熙皇帝臨習、生活痕跡。

關鍵詞：康熙皇帝、集字、董其昌、古詩十九首、崔瑗座右銘、李白詩

The Kangxi Emperor's Activities Related to Collecting Characters: A Discussion from Several Versions of *Nineteen Old Poems* in Dong Qichang's Name

CHIEN Hsin-chen

Abstract

Dong Qichang (1555-1636) wrote *Nineteen Old Poems* several times throughout his life, the recipients of two of which have been determined as Dong Qichang's friends Fang Jikang (1579-?) of Xin'an and Xu Weixin (1551-1628) of Shandong. Another version w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Bai family in Nanhe, Hebei. Among them, the work presented to Fang Jikang as a gift is still extant and in the form of an album; it was once in the possession of Di Xuegeng (1820-1899) and Di Baoxian (1872-1941). A copy of this album on silk in handscroll format now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was made by Song Jue (1576-1632); it had been passed down in the Ge family collection of Pinghu for three generations and included in Ge Jinlang's (1837-1890) *Airi yinlu shuhua lu* and Ge Sitong's (1867-1935) *Airi yinlu shuhua bulu*. There are a forged colophon and seals of Zhou Lianggong (1612-1672) on the Shanghai Museum handscroll. Although fake, the information therein is of important value for reference. The date of the Shanghai Museum copy follows that mentioned in Cheng Jiasui's (1565-1643) *Songyuan langtao ji* and probably can be limited to around the *jiayin* year (1614).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lso has a handscroll version of Dong Qichang's *Nineteen Old Poems*. This work was done on Jinsushan sutra paper and had once been severely cut apart, so much that some parts of it had even been separated into individual characters. Later, it was remounted twice, the first time involving the scattered pieces of the original handscroll remounted as ten album leaves. However, many pieces of paper were misplaced, making for an odd layout and uneven line spacing. The second remounting remounted the album leaves back into a handscroll. The general appearance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version before it was cut into pieces can be seen in *A Sequel of the Model Calligraphy of the Hall of Shuzhong* (*Shuzhongtang xutie*) traced and engraved by Dong Hao (fl. ca. late 16th-17th c.), a grandnephew of Dong Qichang. However, when *Shuzhongtang xutie* was engraved in stone, the *yimao* (1615) colophon o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version was not included and instead the *jiayin* (1614) colophon from another version of *Nineteen Old Poems* substituted in its plac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lso has two other works by Dong Qichang (*Motto of Cui Yuan* and *Poetry of Li Bai* in album format) which had also been cut into pieces and remounted.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Nineteen Old Poems* and *Poetry of Li Bai* were once considered by the compilers of the Qing imperial catalogue *Shiqu baoji xubian* to be recorded in it but later removed, only to be finally included later in *Shiqu baoji sanbian*. The method of cutting up these three works now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is similar and probably done so as part of the activities related to collecting characters for copying by the Kangxi emperor (1654-1722, r. 1661-1722), and they may have been remounted in the Kangxi reign as well. The three works thus reveal much evidence of the training in calligraphy and life of the Kangxi emperor.

Keywords: Kangxi emperor, collecting characters, Dong Qichang, *Nineteen Old Poems*, *Motto of Cui Yuan*, *Poetry of Li Bai*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一、前言

董其昌（1555-1636）的同名書法作品間經常有異文情形，與現行文本相較亦有文句出入，顯然董其昌經常以默書或背臨方式反覆書寫他喜愛、熟稔的詩文、法帖，如嵇康（223-262）〈養生論〉、謝惠連（407-433）〈雪賦〉、鮑照（約 414-466）〈舞鶴賦〉、班固（32-92）〈燕然山銘〉，以及本文的討論主體〈古詩十九首〉等名篇。¹

關於董其昌（款）的〈古詩十九首〉，筆者共尋得四件現存墨蹟本。其中一件為冊頁，藏地不詳，但數見於出版品中；² 一件在廣東省博物館，狀況不明，存疑待考。³ 剩餘兩件分藏上海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另有幾件僅見於文獻中，將在下文予以討論。

過去學界對董其昌〈古詩十九首〉的研究主要有黃惇〈明代「仿書」創作模式的出現——從祝允明到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的討論〉與凌利中〈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辨偽及作者考〉。黃文著眼於明代盛行的一種借鑑前人筆意的創作模式「仿書」；⁴ 凌文指出上海博物館所藏董其昌（款）〈古詩十九首卷〉實為宋珏（字比玉，1576-1632）臨作。⁵

筆者在查考董其昌〈古詩十九首〉時，偶遇一些線索似可與一個我長年抱持的疑問作連結，即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書蹟水平落差的問題。雖然非名家的臨書與自運作品間常見此種狀況——臨書是依樣畫瓢，不須思考章法結字，明顯較易；自運則須全局盡握。然而，許多康熙皇帝的作品從款題來看並非臨作，而是「自運」。那何以年份相去不遠的康熙「自運」墨蹟間存在不合常理的水準差異？此困惑在筆者心中已縈繞多年，不得而解，時至今日終於窺得一線曙光。

依現存可靠康熙皇帝書蹟來看，其臨作款識幾乎皆會題上「臨某書家」，故我們能夠有效分辨其臨仿與「自運」的作品。⁶ 其臨作水平較為一致，就算未能精到表現原作精髓，相對仍維持一定水準（圖 1、2）。而「自運」的書作水平懸殊，有一些尚可稱佳作（圖 3、4），但字形似與康熙皇帝平時的書寫習慣不一致，如〈朱子詩刻〉中的「芳」、「識」二字（見圖 3；另參後文表 3）；另一些較差的「自運」作品，則多有結字上的毛病，其中也不乏與上述「自運」佳作年代相近的（圖 5、6）。鑑於康熙皇帝存世墨蹟中數量最龐大、最可信非贗作、涵蓋年份最廣的御筆硃批，字形結構多半並不理想（圖 7、8、9、10），筆者認為這種書法水平上的落差，應非源於書體變化或大、小字體的難易度有別，也未必來自創作年代不同或書寫狀態的乖、合。康熙皇帝對間架結構的認知落差，似已超出合理的浮動範圍，故筆者始終深信其較高明的書作應存在某種暫時提升水平的「作弊」手段。

¹ 參閱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冊 3，頁 1220-1276。

² 古原宏伸、傅申編集，《董其昌の書画》（東京：二玄社，1981）。（明）董其昌，《董文敏寫古詩十九首神品》（上海：有正書局，原書無出版年，珂羅版景印本）。河井荃廬監修，《支那墨蹟大成》（東京：國書刊行會，1974；據東京興文社 1937 年版再版），卷 5（冊頁（一）連頁），頁 37-61；卷 13（釋文·書人小傳），頁 79-82。

³ 有目無圖，僅見於《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文字附錄中「粵 1-0187 明 董其昌 行書古詩十九首 卷 紙」。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冊 13，頁 337。

⁴ 參閱黃惇，〈明代「仿書」創作模式的出現——從祝允明到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的討論〉，收入明道大學中國國學研究所編，《尚古與尚態：元明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萬卷樓，2013），頁 359-395。

⁵ 凌利中，〈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辨偽及作者考〉，《上海博物館集刊》，2005 年 10 期，頁 55-81。

⁶ 今日冠以康熙帝之名的贗品甚多，原因主要在於較易模仿，作偽難度不高。再來是由於其皇帝的特殊身份，康熙皇帝一般不落上、下款，僅用璽印，且許多作品無年款，較難建立風格分期的比較基準。因此，本文將優先考慮取用兩岸故宮中的清內府舊藏。其餘尚有分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硃批奏摺，以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 63-67 中所錄御書石刻等可信度最高。

過去學界對於康熙皇帝書法的關注點多在康熙皇帝對董其昌書風的好尚、大量頒賜御書的政治意義、書學觀，以及御書作為皇朝統治的政治工具的功能性等議題。⁷ 其中惟有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提到康熙帝晚年所作的幾篇序文「所書字下原有淡墨細筆底稿」；劉家駒〈康熙皇帝的啟蒙教育——由其硃批中的錯別字談起〉中言及康熙硃批中的錯別字主要與其幼年時所受的漢文教育相關；此二文所提供的資訊似稍可與筆者長年思索的康熙皇帝的書法水平浮動問題作聯繫。前輩學人已對康熙皇帝的書法相關議題作出了極為卓越的貢獻，但仍未完全解答筆者心中困惑。關於此疑問，下文應可為一解。

二、冊頁本〈古詩十九首〉

董其昌所書的其中一件〈古詩十九首〉今日藏地不明，但數見於出版物中，分別是古原宏伸、傅申所編《董其昌的書畫》、民國年間有正書局珂羅版景印本《董文敏寫古詩十九首神品》、1937年日本興文社出版《支那墨蹟大成》第五卷。上海博物館凌利中已指出此作與上博本為雙胞，此冊頁本為董其昌真蹟，上博本則為明末宋珏所臨。⁸ 此件作品內容為董其昌所書〈古詩十九首〉，後隨董其昌三跋（圖11-1至圖11-24）。因篇幅之故，此處省略〈古詩〉部份的釋文，僅錄董其昌後跋如下：

第一跋（圖11-22）：

祝希哲詣文休承，屬休承之吳市。案上有高麗繭紙，為書〈十九首〉。書竟，休承猶未歸，紙有餘地，又為書〈楞嚴歌〉、〈秋風辭〉，停雲館所刻是也。祝書，人不知其所自，余見褚遂良行草〈陰符經〉于廣陵，亟謂友人吳生曰：「此祝京兆衣鉢也。」及披尋卷尾，有希哲款印，吳始服予具眼，因書〈十九首〉識之。〈東城〉一首，舊誤為一，今正之，當二十首。庚戌（1610）重九後二日。董其昌。鈐印：「太史氏」、「董其昌」。⁹

第二跋（圖11-23）：

余訪方季康於岩之期麓，出所臨〈聖教序〉，深得晉、唐筆意，咄咄嘆賞，喜海內書苑中更增一人。季康猶嗜昌歌不已，因以所書〈古詩十九首〉貽之，且請品其離合，尤願季康以〈聖教序〉書法寫〈十九首〉為報，勿走忘羊路如予也。庚戌（1610）十月之望。董其昌再題。鈐印：「董其昌」。

⁷ 主要有陳捷先，〈康熙皇帝與書法〉，《故宮學術季刊》，17卷1期（1999秋），頁1-18；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5期，頁89-104；Jonathan Hay,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 Hung Wu et 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11-334；莊吉發，〈翠華南幸——以康熙皇帝南巡御書留題為中心〉，《故宮文物月刊》，409期（2017.4），頁68-79；莊吉發，〈龍章鳳藻鐵畫銀鈎——康熙皇帝論書法〉，《故宮文物月刊》，111期（1992.6），頁112-127；何炎泉，〈萬幾餘暇怡情翰墨——從三件院藏品看康熙皇帝書法及其書學〉，《故宮文物月刊》，344期（2011.11），頁40-49；張萬興，〈從起居注看康熙帝頒賜御書的政治功用〉，《歷史檔案》，2012年2期，頁85-88；尹一梅，〈《石渠寶笈》著錄的一件康熙皇帝御書拓本〉，《中國書法》，總271期（2015.11），頁187-191；劉家駒，〈康熙皇帝的啟蒙教育——由其硃批中的錯別字談起〉，《故宮文物月刊》，109期（1992.4），頁26-37；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秋），頁199-230；蘇雅芬，〈蔣廷錫（1669-1732）《畫群芳擷秀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⁸ 參閱凌利中，〈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辨偽及作者考〉，頁55-81。

⁹ 此跋意指前人將〈古詩十九首〉裡的第十二首〈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視為同詩，董其昌卻主張應一分為二。本文中古詩的序數依董說，故共計二十首。

第三跋（圖 11-24）：

己未（1619）五月之望，舟次京口，季康為秉燭游，縱談書道，都非昔人論書窠臼，季康亦甚解頤，張子房所謂「告他人輒不省者」也。有口能言筆不隨，¹⁰則余自愧。董其昌再題。¹¹

《支那墨蹟大成》將此作（以下稱「冊頁本」）收入第五卷「冊頁（一）連頁」當中。從各開左、右側之字時時異常貼邊，以及第二十二開（董其昌第一跋，圖 11-22）後三分之一處曾經過接紙接成與他開冊頁相同大小等線索來看，可知現存裝裱形式非原裝。筆者認為「冊頁本」原應為長卷，後改裱為共二十四開的經摺裝冊頁。¹²

董其昌的第二跋（第二十三開，圖 11-23）「余訪方季康於岩之期麓」，所用之紙應與他開相異。此紙隱現界欄，且只有董其昌所書部份有，約後三分之一開無界欄，似以其他紙接紙至與他開相同大小。既然第二跋須換紙，代表二、三跋為後裝，第一跋應是董其昌最初書寫時紙盡之處。第二跋書於庚戌（1610）十月望日，董其昌以不同紙張新題贈送〈古詩十九首〉書作予方季康（1579-?）¹³的因由。第三跋（第二十四開，圖 11-24）從內容來看，與前二跋及作品主體〈古詩〉未必絕對有關聯；第三跋跋文作「再題」可知必有前文，但並非一定是接於本作末尾。

「冊頁本」第一開首行「行行重行行，與君」下鈐「曼農偶得」；題簽「董香光仿各家體書〈古詩十九首〉」上鈐「老曼」、「種石軒」、「狄曼農鑒藏書畫印」；第二十四開有押角印「平陵狄學耕」、「曼農平生真賞」、「狄氏種石軒印」。狄曼農即狄學耕（1820-1899）江蘇溧陽人，字曼農，號叔子，室名種石軒，為狄葆賢（1872-1941，號平子，多以號行）之父。狄平子在光緒三十年（1904）創辦有正書局。¹⁴可知此卷經狄學耕、狄平子父子遞藏，又在狄平子經營的有正書局出版珂羅版景印本。今則不知所蹤。

至於題跋中提到的受書人「方季康」又是何許人也？董其昌《容臺別集》：「余曾書〈古詩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之為十九體，山東許尚寶一本，新安門生方胄子亦一本，與此而三。但此本不用

¹⁰ 「有口能言筆不隨」典出米芾（1051-1107）《寶晉英光集》內的〈自漣漪寄薛郎中紹彭〉：「已矣此生為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公自是秘精微。」參閱（宋）米芾，《寶晉英光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冊 1932，頁 13。此用典另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董其昌夏木垂陰圖軸〉上董其昌自跋：「米元章評其書云：口能言而筆不隨。余畫政如此。」顯然董其昌偏好引用此典。

¹¹ 以上董其昌三跋引文，為筆者依古原宏伸、傅申編集《董其昌の書畫》所附釋文修改。

¹² 以現存圖版每開未分左右幅、原作的文本形式為組詩，及《支那墨蹟大成》第五卷卷名為「連頁」來看，應為易於拉展的經摺裝，非蝴蝶裝或推蓬裝。

¹³ 「季康」應為字號，不知其名為何。筆者推斷方季康生年步驟如下：細閱明代程嘉燧《松圓浪淘集》內容後會發覺全書詩作依時間排序。依《松圓浪淘集》總目所載，其中第十八卷嘗甘卷內容提要為：「甲子（1624）上元夕作〈嘗甘〉詩，二月朔至徽州郡城，乙丑（1625）夏來吳中，兩年再至南都，今歲己巳（1629），邑侯屬葺平生蕪稿，得詩十八卷。」可知嘗甘卷收錄 1624 至 1629 年詩作。〈方季康五十贈詩〉入嘗甘卷。又，依據嘗甘卷中各首包含時令、節氣的詩作，以及卷內〈陳眉公七十贈詩〉（陳眉公即陳繼儒（1558-1639），生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一月七日，故陳繼儒七十歲為 1627 年）所在的位置，可推知〈方季康五十贈詩〉創作於 1628 年，故方季康生於 1579 年。參見（明）程嘉燧，《松圓浪淘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原刻本影印）。《松圓浪淘集》的善本常見總目缺漏頁問題，此版本總目俱全無缺，故選用之。

¹⁴ 朱聯保編撰；曹予庭校訂，《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 213-214。狄葆賢自言：「當《時報》出版時，曾著一論焉，不久乃有有正書局之設。」參見狄葆賢著；段春旭整理，《平等閣詩話 平等閣筆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筆記卷 5，頁 214。

各體，似無忘羊歧路耳。」¹⁵ 此段記載亦見於董其昌書；其姪孫董鎬（主要活動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摹勒的《書種堂續帖》中。¹⁶ 其中「許尚寶」應即董其昌友人、萬曆十七年（1589）的同年進士，曾任職於南京尚寶司，籍貫為山東堂邑的許維新（1551-1628）。¹⁷ 許維新與董其昌有一定交情，其所著《許周翰先生稿鈔》中數見寫給董其昌的信札、詩文。¹⁸ 董其昌曾多次贈送書作予許維新，如：「右余庚子歲所臨〈閣帖〉，凡得五卷。一為余門人魏澹明工部所請去，其一卷為東昌許周翰太守藏之，今止存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為友人分割，漸散失盡矣！」¹⁹

筆者查閱《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尋得一件中央美術學院藏、許維新所書的〈古詩十九首〉：「京7-021 明 許維新 行書古詩十九首 卷 絹 天啟壬戌（二年，1622）」。²⁰ 此件作品未見圖版，僅有圖目，但很可能受到董其昌所贈〈古詩十九首〉的影響。許維新此卷若有題跋，很可能提及董作。

上引《容臺別集》中的「似無忘羊歧路耳」呼應「冊頁本」第二跋中的「勿走忘羊路如予也」，交互參照之後可推得「新安門生方胄子」應即本作的受書人方季康。「胄子」應是生員之意，與「尚寶」呼應，皆非姓名字號。可知方季康是新安人，有一定的文化水準。

從上引「冊頁本」第二、三跋可知董其昌數訪友人方季康。另有一件浙江省博物館藏董其昌1604年作〈仿梅道人山水圖軸〉圖上題跋也可見與方季康的交遊記錄，圖面右上角題：「季康既得余此圖，出以相視，復為添跳波樵逕。同觀者吳允符、汪履康、履泰，皆遊畫中山也。董玄宰又題。丁未（1607）十月朔日。」²¹ 由題跋可知，〈仿梅道人山水圖軸〉並非董其昌贈給方季康的，但董其昌在方季康出示此圖後，再度添補圖面組成元素並新加跋語。

三、上海博物館藏宋珏臨本

（一）卷面狀況簡介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董其昌款〈各體古詩十九首〉絹本長卷（圖12），曾於2018至2019年上海博物館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中展出。凌利中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辨偽及作者考〉中，已詳考此卷為宋珏臨仿前述董其昌「冊頁本」，後經鄭簠（1622-1693）收藏、周亮工（1612-1672）題跋，後人割去宋珏題識及周亮工真跋，換上周亮工假跋冒充董書以牟利。凌氏已提及的論點，於此不再贅述。²²

由上博本卷面鈐印可知此卷曾經平湖葛氏三代遞藏，且入葛金烺（1837-1890）《愛日吟廬書畫錄》、

¹⁵ （明）董其昌，《容臺別集》，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刊本，卷2，頁13-14。

¹⁶ 《書種堂續帖》卷四作「余曾書〈十九首〉」。《書種堂續帖》資料感謝臺南謙受堂主人康益源先生惠賜。

¹⁷ 許維新有〈遷官尚寶，得陸年丈寄書扇二事見勉，用韻卻謝。其一得「新」字、其二「環」字。伯達時方還朝，故及之〉、〈力疾赴尚寶之命，留別同社諸君子〉二詩。參見（明）許維新，《許周翰先生稿鈔》（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刊本影印），卷13，頁12。

¹⁸ （明）許維新，《許周翰先生稿鈔》，卷9，〈與董玄宰〉，頁1-2；卷11，〈都下與董玄宰同說蔣美若諸年友，夜遂夢之，晨起口號〉，頁11-12；卷12，〈將去郡，別唐君公、董玄宰、章公觀諸公〉，頁26；卷12，〈別董玄宰〉，頁27。

¹⁹ （明）董其昌，《容臺別集》，卷2，頁20。

²⁰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冊1，附錄頁25。

²¹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圖號作「浙1-066」，釋文為筆者自釋。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冊11，頁44。

²² 參見凌利中，〈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辨偽及作者考〉，頁55-81。

葛嗣澍（1867-1935）《愛日吟廬書畫補錄》。²³茲節錄《愛日吟廬書畫錄》中的記載如下：

絹本。高一尺四分，長二丈一尺二寸。計三接。〈東城〉一首分為二作。二十家書。全詩不錄。第一首用皇象筆意……第十三首用懷仁〈聖教序〉筆意……第十九首用黃魯直筆意；第二十首用米芾筆意。

祝希哲詣文休承，屬休承之吳市。案上有高麗繭紙，為書〈十九首〉，書竟，休承猶未歸，紙有餘地，又為書〈榜枻歌〉、〈秋風辭〉，停雲館所刻是也。祝書本褚遂良行草〈陰符經〉。因書〈十九首〉識之。〈東城〉一首舊誤為一，今正之，當二十首。庚戌重九後二日，董其昌。（無印）

〈董文敏各體十九首〉，向在莆田黃若木教諭家。教諭沒，命其婿歸予，乞予志其墓。其婿不肖，以三斗粟易之林小眉。林後以重資歸之孔學憲文在，余曾一見之。〈十九首〉流傳數處，近為吾友鄭汝器所寶。汝器工行楷，恆藏文敏書，可謂知文敏者矣。予不獲藏若木之卷，得時時從汝器展視此卷，雖不得仙，亦足自豪矣。壬寅上巳，櫟下周亮工題於情話軒。印二：「亮工之印」（白文方印）、「周氏元亮」（朱文方印）。

收傳印記：「自娛」（朱文長方印）、「曾在李鹿山處」（朱文長方印）、「周亮工鑒定真跡」（白文長方印）、「周元亮借觀過」（朱文方印）、「（每接騎縫印一）」「居業堂」（朱文方印）。²⁴

《愛日吟廬書畫錄》中所載此卷狀況，除了未錄葛氏祖孫三代鑑藏印記外，與今日情形大體相同。比較上博本與董其昌原作後，可以發現上博本在藝術表現方面並非完全臨仿，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發揮。其中追摹、揣想皇象（三國時期吳人）筆意的第一首古詩〈行行重行行〉，從字形來看並非模仿董其昌，而是摻入了許多宋珏自身對皇象筆意的理解（圖 13）。宋珏以隸書名世，皇象章草亦有隸意，因此宋珏版本的第一首古詩，章草特色其實遠比董書明顯。另一宋珏對原作的改動是在第十三首〈燕趙多佳人〉，改用「懷仁聖教序」筆意（董其昌原作為「陸柬之」筆意）（圖 14）。董、宋二人的詮釋顯然與今日我們對〈集字聖教序〉與陸柬之（585-638）書風的印象有所差異，但在此暫不岔開多作論述。作者宋珏在臨仿之際仍留有自我表現的餘地，依循明代時風有意識地將原應作為練習之用的臨書轉化為自身書作。且絹布的價格顯高於紙，所以宋珏書寫時很可能已預料到它將作為書法作品傳世。

凌利中研究已指出周亮工真跋的文本收錄於周亮工《賴古堂集》，以及上博本卷末周亮工跋為偽。筆者在此想補充周亮工偽跋（即《愛日吟廬書畫錄》中所錄），與偽印應皆有所本。錄周亮工《賴古堂集》中真跋跋文如下：

〈宋比玉臨董文敏各體十九首跋〉

比玉人知其善分書，不知其行楷俱登峰造極。人恆索其分書，比玉亦以漢隸應之耳。其合行楷、漢隸為一卷者，為〈六體千文〉。離漢隸單為行楷者為〈摹董文敏各體十九首〉。〈千文〉向在莆田黃若木教諭家，教諭沒，命其婿歸予，乞予誌其墓。其婿以三斗粟易之林小眉，林後以重資歸之孔學憲文在，余曾一見之。〈十九首〉流傳數處，近為吾友鄭汝器所寶，汝器作分書直駕比玉而上，恆為余言：「此老之工行楷不在分書下。」可謂知比玉者矣！比玉自言：「臨此卷如撐上水船，不離故步。」予觀其卷直入古人之室，豈第雁行？文敏此當是駕長風

²³ 上博本上鈐印主要可參見上海博物館編，《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冊4，頁21-25。另參（清）葛嗣澍，《愛日吟廬書畫補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所收原據善本掃描檔，民國二年葛氏刻本，頁4。

²⁴ 《愛日吟廬書畫錄》所錄的「周元亮借觀過」一印，經筆者細審其所據圖像後，似應為「借觀一過」。（清）葛金娘，《愛日吟廬書畫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據清宣統二年當湖葛氏刊本影印），卷2，頁8-9。

破萬里浪，乃云「撐上水船」耶？予既失若木〈千文〉，得時時從汝器展視此卷，不異我有矣！²⁵

筆者認為裁去周亮工真跋、宋珏真跋者，應與製作周亮工假跋的人為同一批。周亮工假跋與真跋文句類似，顯然是從真跋刪節修改過來的。而《賴古堂集》並未記錄今日已佚的真跋上應有的時間、地點、名款等款識應有的元素，那麼，現在上博本上的「壬寅（1662）上巳。櫟下周亮工題于情話軒」的題款恐怕就有意義。又，「情話軒」的確是周亮工齋號。²⁶也就是說，假跋的年款與地點款可能是來自於真跋。因此，跋雖為假，所傳達的時間、地點很可能為真，只是在《賴古堂集》中被省略不錄。

至於周亮工印章的問題，押在今日周亮工假跋後方的「亮工之印」、「周氏元亮」二印必偽，而且它們與《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裡歸屬於「周亮工」名下的所有出處非此節的討論主體上博本，而是取自其他書畫上的「亮工之印」、「周氏元亮」印都有些微差異。²⁷那麼，分別位於卷首、卷末的「周亮工鑒定真跡」和「周元亮借觀一過」二印的真偽又是如何？筆者翻閱周亮工《賴古堂印譜》，未見此二印。²⁸但北京故宮所藏黃庭堅（1045-1105）〈諸上座帖〉有「周元亮借觀一過」印，與上博本上的印有細節上的區別（圖 15）。故可推知上博本周亮工四印應皆偽，但很可能是依據被裁掉的段落上的真印所假造的。

上博卷畫心部份由四絹相接而成，分別是：

「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行前為第一絹。

「服紬與素。懷素聖母帖」行前為第二絹。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行前為第三絹。一、二，二、三，三、四絹間騎縫處皆有李馥（1666-1749）²⁹「居業堂」印。

餘下內容為第四絹。第四絹與後裱綾相接，綾後為周亮工（款）假跋。

（二）第三絹後裁去的内容

筆者分別測量四絹的相對長度後，得悉一、二絹長度極為接近，第三絹則略短於一、二絹。因此，若第三絹原長與第一或第二絹相等，則第三絹有可能曾被截短過。而第四絹則遠短於其他三絹，本身便只有一小段。但三、四絹相加又長於第一絹或第二絹的長度，故可知三、四絹並非同一絹被裁開成兩塊。而從三、四絹間接縫的李馥「居業堂」印可推得，若第三絹曾被截掉一段，則傳到李馥手上時應已是如此。

²⁵（清）周亮工，《賴古堂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卷 22，頁 10。

²⁶ 山西省博物館藏周亮工〈行書情話軒近詩卷〉，款識作：「庚子（1660）嘉平十八日大梁周亮工題於情話軒。」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冊 8，頁 130-131。此外，周亮工：「……亦不敢勞為壽詩，但希賦〈情話軒酌酒與櫟老人歌〉，則錫躡百朋矣！」見（清）周亮工，《賴古堂集》，卷 20，〈與張瑤星〉，頁 16；「予亦不更向君索竹，得於情話軒蕭蕭數竿中。」見（清）周亮工，《賴古堂集》，卷 23，〈書馮幼將畫竹卷後〉，頁 7。

²⁷ 《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將上博本稱為〈董其昌各體書古詩十九首卷〉，尚非後來依據凌利中研究更名的〈宋珏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參見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冊上，頁 606-609。

²⁸（清）周亮工著；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冊 17。

²⁹ 李馥有每年生辰作生日詩的習慣，其出生年可依其著作《居業堂詩稿》得知為 1666 年。例如〈戊申（1728）生日〉詩中有「六十加三又此辰」；〈甲寅（1734）生日〉詩中有「年今六九猶為客」句。參（清）李馥，《居業堂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抄本影印），冊 219，頁 188、198。另參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268。

第三絹末行與第四絹首行（參圖 12 中的「離此。黃魯直」行與「明月何皎皎」行）間存在明顯起筆位置落差及字體大小差異，顯然不符合一般書寫習慣，且董其昌原帖的狀況僅是略有落差。綜合第三絹長度與落差兩條線索，意味第三絹末尾極有可能曾被截掉一段。但目前無法確知被割離的內容為何，以及裁切者究竟是誰。

筆者設想了兩種可能，略述於下，但其中仍存若干難解及矛盾之處，待有識者正之。

1. 第三絹後被捨去的內容即宋珏原跋，為作偽者所裁

周亮工《賴古堂集》裡的〈宋比玉臨董文敏各體十九首跋〉中提到「比玉自言臨此卷如撐上水船，不離故步。」³⁰ 周亮工與宋珏的活動年代雖有一小段重疊，但兩人應無往來。³¹ 上博本必然曾有宋珏題跋，周亮工、鄭簠等人才得以不經考證而確知作者是宋珏。又，一般書畫題跋內容多是與作品相關的心得感想，或是回應之前題跋者的跋語，所以這句宋珏的臨書心得極可能引自如今已被割去的宋珏原跋。那麼，被割去的宋珏跋的位置在哪裡呢？

上博本臨書來源的母本「冊頁本」上有董其昌三跋，但上博本僅臨有董其昌第一跋，而且刪節董其昌原跋內容，非照抄全錄（但跋文字形未有大更動，仍維持董書風貌），以臨書的角度來說相當不合理。故此跋所在之處是否有可能即宋珏書寫時的真正卷末呢？之所以刪節董其昌原文文句是由於餘下的絹布太短，無法臨完原本的董書第一跋。至於宋珏據以臨寫的董其昌原作「冊頁本」的第二、三跋，此時很可能尚未裝上。

周亮工引述的「撐上水船，不離故步」的宋珏原跋，或可讓人聯想到書法史中最著名的「水船」典故，即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黃庭堅《花氣薰人帖》的「八節灘頭上水船」，而第三絹末尾正是以黃庭堅書風所書之古詩〈客從遠方來〉。因此，筆者猜想是否宋珏被裁去的原跋，並非在一般習見的卷末，而是接於以黃庭堅書風所書的古詩之後呢？若是如此，第三絹尾端被裁去的內容，可能就是宋珏的跋語。立基於此假設所推論出的宋珏書寫過程是——宋珏書畢第一絹、第二絹，在臨完第三絹上的黃庭堅書風部份時，忽然興之所至，寫下了一段包含「撐上水船，不離故步」的題跋，接下來隨意估算了董其昌原卷上殘餘未臨的部份後，拿取或裁剪一段畸零絹布繼續臨寫，但寫至董其昌第一跋時，發現所餘絹布不足，便簡省餘下文句，以使文意完整結束。

若第三絹後確實原為宋珏跋，那麼，由李馥「居業堂」印所在的位置，可知此卷被作偽者裁去宋珏真跋冒充董書的時間最可能落在周亮工之後，李馥以前。不可忽略李馥本人也有改動此作的嫌疑，不過李馥是著名藏書家，貲財頗富，變造書畫牟利的機率相對偏低。

2. 第三絹末尾為書家宋珏本人裁去

筆者曾懷疑過第四絹整絹皆是作偽者為了掩藏卷末款題披露的真正作者身份，而修改宋珏原跋內容後重新臨寫的，但細看覺得並非如此。第四絹行筆自然流暢，且書風與前三絹統調。因此，若第三絹末段是宋珏本人因筆誤、髒污或其他原因而割去，並非被後來的作偽者所裁，宋珏跋便該在一般最常見的跋語位置，即卷末，亦即第四絹的末尾，接於其所臨的刪節版董其昌第一跋後方。

³⁰ （清）周亮工，《賴古堂集》，卷 22，頁 10。

³¹ 今日宋珏著作大多散佚不傳。《周亮工全集》中未見周亮工與宋珏交遊的記錄，僅有周亮工輯錄明末清初文人尺牘的《尺牘新鈔》中選錄宋珏〈與邦衡書〉。參閱（清）周亮工著；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冊 8，頁 135-136。

「撐上水船，不離故步」的正確出典並非黃庭堅，事實上此典為化用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中所引米芾（1051-1107）語「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³²且恰接在以米芾書風所書的最後一首古詩之後。

然而，如果是此種情形，則宋珏對董其昌第一跋的刪節似難以索解。由於宋珏自己的款題完全可以在臨畢董其昌原跋後，再依據所餘絹布長度調整自跋文句。因此，若宋珏跋位於卷末，便沒有刪節董其昌第一跋的必要。或許是宋珏臨寫董跋到半途筆誤，索性不在字旁加點點去錯誤，而是將錯就錯改動董其昌第一跋令文意完整？

（三）藏傳過程

此作被作偽者裁去原跋的時間必落在周亮工題跋（依前文推論，周跋時間應為1662年）之後，下限則為入葛金煊「愛日吟廬」收藏記載之時。以一般書畫著錄的習慣而言，會登錄前人的鑒藏印，但一般不記著錄作者本人的藏印。筆者認為製作周亮工贗跋、偽印者與割去宋珏、周亮工跋的人應為同一批，而《愛日吟廬書畫錄》中不錄「煜珊審定真跡」、「平湖葛氏愛日吟廬入錄之品」等藏印，但已錄入所有周亮工假印。雖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葛氏家族造假的可能，但嫌疑顯然極小。且割去後跋，將畫心偽裝成董其昌作品最可能的動機是牟利，但葛家遞傳此作三代皆未出售。

由以上考察可知此卷的藏傳過程為：

宋珏（1576-1632）→流傳數處（依周亮工跋語）→鄭簠（1622-1693；其友人周亮工於1662年借觀並題，此時真跋仍在）→李馥（1666-1749，號鹿山，堂號居業堂）→葛金煊（1837-1890，號煜珊；此時宋珏、周亮工真跋業已裁去）→葛嗣澍（1867-1935，字詞蔚，葛金煊之子）→葛昌楹（1892-1963，字書微，葛嗣澍之子）→上海博物館。

（四）創作年代

關於上博本的年代問題。凌利中已將宋珏臨書的時間段限縮到董其昌創作此卷的1610年至宋珏逝世的1632年之間。³³以下筆者將試圖進一步縮小時間跨度。

首先，由於從現存文獻中難以尋得蛛絲馬跡證明宋珏與董其昌有交遊，筆者更傾向於他們未曾往來。³⁴而且從董其昌書畢所題的第一跋的「庚戌（1610）重九後二日」，到贈送給方季康的第二跋的「庚戌（1610）十月之望」，中間相隔時間短暫，所以筆者認為宋珏從董其昌本人手上看到這件作品的可能性偏低，他應是從受書者方季康處得觀此作的。

翻閱宋珏至交好友程嘉燧（1565-1643）《松圓浪淘集》，其中卷十四「松寥卷」的內容提要為「甲寅（1614）、乙卯（1615），客廣陵方季康家，時遊焦山。」卷內包含許多程嘉燧記錄與宋珏、方季

³²（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清初大魁堂刻本，卷1，頁13。

³³凌利中，〈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辨偽及作者考〉，頁79。

³⁴宋珏的文集今日大多不存。目前關於宋珏的研究相對較完整的是謝麗珍〈宋珏研究〉，其中提到福建師範大學古籍部藏有宋珏《古香齋詩輯》（游定遠1964年抄本），但筆者不得而見。其他筆者尋得的資料如收入鄧慶棠輯《閩中荔枝通譜》的宋珏〈荔枝譜〉；宋珏讎校或編集的陳昂《白雲集》、蔡襄《蔡忠惠詩集全編》、蔡襄《古香齋寶藏蔡帖》等。此外，同時代人的手記中提及宋珏的，諸如明人別集中宋珏摯友程嘉燧《松圓偈庵集》、《松圓浪淘集》、《耦耕堂集》；程嘉燧、吳兆《新安二布衣詩》；李流芳《檀園集》、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方應祥《青來閣初集》、徐燊《紅雨樓集》、葛一龍《葛震甫詩集》等。現存宋珏書畫作品數量不多，散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臺北何創時書法基金會等處及拍賣會中。從上列資料中，筆者並未尋得宋珏與董其昌有直接來往記錄。另外，在目前筆者看過眼的董其昌相關文獻與圖像中，亦不曾見其與宋珏有交遊。

康等人往來的詩作，如：〈由廣陵登金山訪一雨師不遇，同宋比玉〉、〈焦山寺訪湛公，過淨蓮故居，復同比玉和蘇韻〉、〈顧所建席上分得齊字送方季康〉、〈廣陵同舟次吳門與季康、震甫惜別〉、〈走筆別比玉〉、〈書去年臨別畫疏林暮鴉與季康〉、〈雨夜懷比玉〉。雖然「松寥卷」內涵蓋 1615 年詩作，但《松圓浪淘集》各卷所收之詩皆依創作時間排序，細閱後可知宋珏與方季康的會面發生於 1614 年。³⁵

宋珏留下的書法作品相當少，但綜納隸、楷、行、草四體（筆者不曾得見篆書作品），且許多未落年款，因此難以作出精確的風格定年序列。今日現世作品中尤為傑出的是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 1913-1988）舊藏的兩件尺牘。其中一件受信人為李思聰（1569-?，字沮修）的〈與沮翁尺牘〉（圖 16）更是風流恣意，展現了明末書風的遊戲氛圍，又不致流於支離輕滑。此信札中提到黃像之（主要活動於十七世紀）、程嘉燧、李思聰等人的聚會，³⁶ 在程嘉燧《松圓浪淘集》卷十八「嘗甘卷」（收錄程嘉燧 1624 至 1629 年詩）的 1628 年詩作中，此幾人的名字反覆出現，似在此時間段有密切往來，有較高機率〈與沮翁尺牘〉創作的年代大約落於此前後。宋珏 1628 年所作〈觀物之生寫生冊〉上其自跋（圖 17），與〈與沮翁尺牘〉書風類似，都有撇劃中間加重近乎稜角，以及誇張化鉤筆最後的向上挑筆出鋒的特色，但水平略遜一籌。³⁷ 而上海博物館所藏〈宋珏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尤其是其中的行草書，縱使存在書法精妙的董其昌原作可供參照臨寫，與〈與沮翁尺牘〉的水平差異仍昭然若揭。書法功力的進步絕非一蹴可幾，顯見兩件宋珏作品之間必存在時間差。雖然無法完全否決上博本臨於其他年份的可能，但若是臨於 1614 年左右，從書法水平及文獻資料方面來看有其合理性。

而上博本僅見宋珏節臨董其昌第一跋，卻無第二、三跋，何解？筆者認為宋珏臨書時，寫在其他紙張上的董其昌第二跋應仍未裝上。由於作偽者的目的是冒充董書，所以宋珏若臨有第二跋，實沒有被割去的理由。而董其昌第三跋為 1619 年所書，若宋珏此作如筆者上述的推測臨於 1614 年，確實不可能見到 1619 年的董其昌第三跋。因此，宋珏未臨第三跋應亦可作為推斷他臨書時間的旁證之一。

四、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一）卷面狀況簡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紙本〈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圖 18）。因篇幅所限，此處詩略不錄，僅錄董其昌後跋釋文如下：

書〈古詩十九首〉四通，二為高麗紙，一為絹書，此則宋藏紙，倣褚河南〈哀冊〉。乙卯十月朔。其昌識。

此本的狀況相當值得進一步探討。畫心大部份區域曾被拆分成零碎的條、塊狀紙片，諸如字字獨立

³⁵ 一參《松圓浪淘集》卷首總目詳列的各卷涵蓋的日期區段與各卷名的命名旨趣；另參《松圓浪淘集》卷十四「松寥卷」及其相關部份。見於（明）程嘉燧，《松圓浪淘集》，冊 1，頁 33、85-90、425-452。

³⁶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Letter (by Song Jue)." Accessed Sep 15, 2020.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9006>.

³⁷ （明）程嘉燧，《松圓浪淘集》，冊 1，頁 33-34、111-116；《松圓浪淘集》，冊 2，頁 559-584。宋珏大部份作品都帶有一些這種加重以強調特定筆劃的習慣。雖然目前難以建立宋珏的明確書風定年序列，但筆者認為宋珏早、晚期書作的差別，在於較晚期作品在強化特定筆劃致使字的重心偏移之時，有能力同時調整字的整體結構，使之和諧自然，不流於矯飾。較早期的行草書筆劃偏圓，帶有隸意，結字也較傾向刻意、遲疑。參見北京保利 2016 年秋拍夜場的宋珏，〈觀物之生寫生冊〉，《雅昌藝術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96524036/>（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5 日）。

的單字字塊（圖 19）、數個字組成的字條（圖 20）、無字的空白紙塊（圖 21）、包含朱絲界欄的畸零紙條（圖 22）等，其中部份字在裁切時筆劃末端甚至被裁去（某些筆劃缺失的部份在重新裝池後經過粗糙地描補；圖 23），之後經過重新拼合、裝裱才大體上成為我們今日所見的樣貌。然而，整卷行氣章法極度混亂，同時出現了異常鬆散與異常緊密的字距（圖 24），及各行行寬寬窄殊異（圖 25）等，在在顯示了此卷重拼時未盡復舊觀。

卷面相當不整潔，其上有大量或斷或連的墨漬。由卷面痕跡（圖 26）的不連貫，也可證明此卷經過拆分重裱。例如「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句中的「仙」、「多」二字墨痕不連續，顯然是在被重裱之前留下的；「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句中的「墓白」與「楊何」今分屬兩行頭、尾，但都有墨點，此墨點應非巧合，可能是在重裱前一路滴落到卷面上的（圖 27）。另外，也有在重裱後才噴濺上去的墨點（圖 28）。從墨痕的數量和型態觀之，絕非書家董其昌創作時所不慎留下，而是後來的使用者長期將此作品作為字帖時時臨寫導致的。

（二）裁割者的身份

見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異乎尋常的狀況，首先會思考的幾個問題就是裁割者是誰？何時被裁割？目的為何？想當然爾，這種嚴重程度的裁割必然存在某種特殊目的。若僅是為了重裝為簾衣裱或其他裝裱形式而將各行重排，沒有理由將局部畫心割裂至字字分離。甚至還在將字塊、紙條重新裱裝合為一體時，大量拼錯位置，未復歸原貌。考慮紙塊錯置此一結果，亦可反推出拆解作品的緣由絕非單純為了重裱。

從局部呈現字字獨立這一點出發，筆者首先聯想到的用途便是「集字」。而若這種拆解確實是為了集字，那麼被割裂的絕不會僅有一件作品。清宮舊藏今日流散世界各地，最大宗在兩岸故宮。筆者查閱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書畫後，發現另有二件（詳見第六節「其餘二件被拆解的董其昌作品」）作者同為董其昌的作品，亦曾遭嚴重裁切拆分，即〈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圖 29）、〈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圖 30）。³⁸

〈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這幾件作品的品相皆不佳，其上存留大量生活污漬與墨痕，暗示它們曾長期作為習書字帖使用。將三件作品並置檢視，會注意到拆解它們的手法極為相近。紙面上遺留的線索傳達出了類似的隨意心態與手法，故拆毀它們的極有可能為同人。

董其昌在世時已得享大名，何人有條件取得眾多董其昌書作，卻不將其珍而重之地收存欣賞，永為世寶，而是奢侈地連續拆解數件？筆者首先懷疑的對象便是坐擁天下的皇帝。

若此三件作品為同人所拆毀，又可將其人的主要活動年代限縮到這幾件作品皆問世之後。〈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在約 1616 年被董鎬上石時，此卷收入《書種堂續帖》的〈古詩〉部份應仍保持完整（《書種堂續帖》所收後跋非故宮本的「乙卯」跋，後文中將有詳述）；³⁹〈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創作於 1631 年；〈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則無年款。

〈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卷上無作者董其昌鈐印，其他印璽有：「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石渠寶笈」、「嘉慶御覽之寶」、「嘉慶鑑賞」、「寶笈三

³⁸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https://painting.npm.gov.tw>（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5 日）。

³⁹ 依康益源先生惠賜《書種堂續帖》資料。《書種堂續帖》卷四末尾有「萬曆四十四年（1616），歲在丙辰，夏六月，姪孫董鎬彥京氏摹勒上石」款題。

編」。由卷上乾隆五璽俱全，但無「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二印，得知此卷最初一度選進《石渠寶笈續編》又被剔除，最終收入《石渠寶笈三編》（御書房二），亦可確認它最晚在乾隆時期已入清宮收藏。⁴⁰ 觀察卷上的層位疊壓關係，可知卷上的乾隆璽印鈐蓋於拆分重拼之後。因此，可排除乾隆以後的皇帝為拆解〈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的嫌疑人。乾隆之前的皇帝沒有在卷面大量鈐押鑑藏寶璽的習慣，因此無法由璽印確知作品何時入藏內府。嫌疑最大的皇帝可大略限縮到入關之後的幾位，即清世祖福臨（順治皇帝，1638-1661；1643-1661 在位）、清聖祖玄燁（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1678-1735；1722-1735 在位）、清高宗弘曆（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中有一件康熙皇帝的〈臨董其昌書李白把酒問月詩〉（圖 31），與上述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中的「把酒問月」一詩字形結構相似，可知故宮藏本即為該作品的臨書來源。⁴¹ 因此，我們能夠確認今日故宮所藏〈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在康熙時期已入藏清宮。

康熙帝對董其昌書法的推崇廣為人知，如《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

朕萬幾餘暇，臨摹古人書法，於明董其昌真蹟尤加欣賞……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二十九日。⁴²

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昌淵源合一，故摹諸子輒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草書亦縱橫排宕有古法，朕甚心賞。其用墨之妙，濃淡相間，更為寬絕。臨摹最多，每謂天姿與功力俱優，致此良不易也。⁴³

如果拆毀此三件作品者為同一人，又作品上留有若干臨習、生活痕跡，則無疑康熙皇帝的可能性最大。上列其他幾位清帝雖亦曾學董，但由現存資料觀之，積極程度則遠不及康熙皇帝。

順治帝在位時期初入關，相關記錄較為缺乏。⁴⁴ 筆者在尋得的雍正皇帝的現存書法作品及《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欽定皇朝通志》等書中，未見與上述三件作品相關

⁴⁰ 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https://painting.npm.gov.tw>（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5 日）；（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影印清嘉慶內府抄本），冊 1079，頁 318；王崇齊，〈《石渠寶笈三編》相關印記的鈐押〉，《故宮文物月刊》，328 期（2010.7），頁 79。

⁴¹ 郭秀蘭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書法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110。

⁴² （清）清聖祖御製；（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298-1299，集 3，卷 8，〈諭扈從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翰林查升、陳壯履、錢名世、蔣廷錫、汪灝、勵廷儀等〉，頁 2。

⁴³ （清）清聖祖御製，《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集 2，卷 40，〈跋董其昌墨蹟後〉，頁 11。

⁴⁴ 主要有《石渠寶笈》（初編）「乾清宮」中「世祖章皇帝御筆」部份。參見（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初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824-825，卷 1，頁 1-3。北京故宮所藏《懋勤殿法帖》卷一中所收「世祖章皇帝御書」，參見薛永年、王連起總主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北京：故宮出版社；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冊 30，頁 34-43。另參尹一梅，〈清代宮廷刻帖述論〉，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輯 9，頁 505；容庚，《叢帖目》（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6），冊 4，頁 1681。

的記載。⁴⁵ 至於《石渠寶笈》叢書（《秘殿珠林》叢書所收為宗教題材，故與三作應不相干）中也不見任何與順治帝、雍正帝相關的敘述能夠與此三件作品連結。那麼，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所為嗎？乾隆皇帝的嫌疑無疑較低，因為若乾隆皇帝先拆解此卷，後重新拼接裝潢，再押收藏印，而非取得作品之後直接鈐蓋鑑藏寶璽，顯然不合常情。

筆者嘗試以較為簡單明瞭的方法，來尋找是否有更多的董其昌原作被拆毀。筆者粗略統整了曾被上述四位清代皇帝臨習的董其昌（款）作品，能否在著錄清內府收藏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乾隆十年（1745）成書）、續編（乾隆五十八年（1793）成書）、三編（嘉慶二十一年（1816）成書）中尋得對應記錄。順治皇帝御臨董其昌作品僅《石渠寶笈》初編〈世祖章皇帝御臨諸名家帖〉五冊中的第四冊有〈臨董其昌一則〉，在未見圖版的情形下，難以判斷與其對應的董其昌原作。《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系列中所錄乾隆皇帝曾臨寫過的董其昌（款）原作幾乎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中皆可尋得，且其所臨董其昌（款）作品實體今日多仍存放於兩岸故宮。至於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情況則較為複雜，參見表 1。

表 1 的採擇原則說明如下：

1. 筆者僅列出《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中，與清帝所臨董其昌作品對應的董其昌「同名」原作（董其昌經常反覆書寫喜愛的文本，留下大量同名之作。因此，與清帝所臨之作「同名」未必就是同一件作品，但若完全確認臨書來源則相對困難）。
2. 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收錄的清帝作品與董其昌作品中，包含了許多詩帖、雜帖、臨某人書、古詩、唐詩、宋詞、五（七）言律詩（絕句）等品名較為籠統，所錄描述也常偏向簡略，導致不易確認具體指涉對象的作品，故表 1 中省略不列。
3. 部份清帝墨蹟可能即為同名法帖的上石來源，但今日清宮刻帖多未完整出版，以致筆者無法確認墨跡與刻帖兩者間的關係，故表 1 中仍暫分開列出。
4. 鑑於雍正皇帝現世書蹟大多完成於其未登基之際，此時內府收藏主要仍受康熙皇帝所控，故表 1 納入雍正帝書作。

表 1：《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中的康熙帝、雍正帝御臨之作與其所對應的董其昌同名作品

作者	品名	御書臨作出處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中是否有董其昌的同名之作	備註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舞鶴賦〉一卷	《寶笈初編》	是，《寶笈續編》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舞鶴賦〉	《寶笈續編》中的《避暑山莊御筆法帖》	同上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上石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滕王閣序〉一卷	《寶笈初編》	未見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滕王閣序〉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同上	康熙三十二年（1693）臨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⁴⁵ （清）清世宗御製，《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300。雍正朝《起居注冊》分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參見《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臺北：聯經出版，2015，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北京：中華書局，2016，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主要參考《欽定皇朝通志》中的「金石略」部份，見（清）清高宗撰，《欽定皇朝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45，卷 115-121。



作者	品名	御書臨作出處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中是否有董其昌的同名之作	備註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駕幸太學賦〉一卷	《寶笈初編》	未見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麒麟賦〉一卷	《寶笈初編》	未見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五柳先生傳〉一卷	《寶笈初編》	未見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樂志論〉一軸	《寶笈初編》	是，《寶笈初編》、《寶笈三編》	
康熙皇帝	〈聖祖御臨董其昌書樂志論〉	《寶笈續編》中的《懋勤殿法帖》（八冊）	同上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上石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蘭亭帖〉一軸	《寶笈初編》	無法確定「蘭亭帖」此一帖名的具體指稱對象。相關作品有：〈明董其昌臨蘭亭敘〉一冊（《寶笈初編》）、〈明董其昌臨褚遂良蘭亭敘〉一冊（《寶笈初編》）、〈張照臨董其昌書柳公權蘭亭詩帖〉一軸（《寶笈初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 ⁴⁶	
康熙皇帝	〈聖祖御臨董其昌書蘭亭詩序〉	《寶笈續編》中的《懋勤殿法帖》（八冊）	是，《寶笈續編》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上石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老人星賦〉一軸	《寶笈初編》	未見，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清宮舊藏〈明董其昌書南極老人星賦軸〉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老人星賦〉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同上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焦秉貞（主要活動於清康熙時期）、康熙皇帝	〈焦秉貞畫池上篇圖〉一軸（畫上方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池上篇）	《寶笈初編》	未見，但常見於刻帖中 ⁴⁷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池上篇〉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同上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聖祖御臨董其昌書白居易池上篇〉	《寶笈續編》中的《懋勤殿法帖》（二十四冊）	同上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石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董其昌）書金剛經〉一冊	《珠林初編》	是，《珠林初編》	康熙三十二年（1693）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董其昌）書金剛經〉一冊	《珠林初編》	是，《珠林初編》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董其昌）書陀羅尼經〉一卷	《珠林初編》	是，《珠林初編》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董其昌）書陀羅尼經〉一卷	《珠林初編》	是，《珠林初編》	康熙五十八年（1719）

⁴⁶ 董其昌，〈行書臨柳公權書蘭亭詩卷〉，《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handwriting/230480.html>（檢索日期：2020年9月15日）。

⁴⁷ 可參考《叢帖目》中所錄董書刻帖部份。另外，乾隆末年孔繼涑摹勒的《國朝名人法帖》中錄有一件沈荃〈臨董書白樂天池上篇並自跋〉。沈荃擅長董其昌書體，曾入直南書房，以書法深得康熙帝寵遇。因此，若沈荃臨過一件董其昌〈池上篇〉，有一定可能是在清宮侍值時見到的。容庚，《叢帖目》，冊3，主要在頁1220-1276；冊2，頁498。

作者	品名	御書臨作出處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中是否有董其昌的同名之作	備註
康熙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董其昌書大道贊〉一卷	《珠林初編》	未見，但北京故宮藏有一件〈董其昌楷書大道贊卷〉 ⁴⁸	
康熙皇帝	〈聖祖御臨董其昌書寶硯誥〉	《寶笈續編》中的《懋勤殿法帖》（八冊）	未見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上石
康熙皇帝	〈聖祖御臨董其昌書燕然山銘〉	《寶笈續編》中的《懋勤殿法帖》（八冊）	是，《寶笈初編》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上石
康熙皇帝	〈聖祖御臨董其昌書劉伶酒德頌〉	《寶笈續編》中的《懋勤殿法帖》（二十四冊）	是，《寶笈初編》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石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愛蓮說〉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未見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內景經〉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是，《寶笈三編》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天馬賦〉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是，《寶笈初編》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參星賦〉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未見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應指米芾〈參賦〉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白羽扇賦〉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是，《寶笈三編》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飲中八仙歌〉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是，《寶笈初編》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帝京篇〉	《寶笈續編》中的《避暑山莊御筆法帖》	未見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上石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岳陽樓記〉	《寶笈續編》中的《避暑山莊御筆法帖》	未見，但北京故宮有一卷王時敏（1592-1680）舊藏本（圖32） ⁴⁹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上石
康熙皇帝	〈臨董其昌書莊子說劍篇〉一卷	《寶笈三編》	未見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康熙皇帝	〈聖祖御臨董其昌書莊子說劍篇〉	《寶笈續編》中的《懋勤殿法帖》（二十四冊）	同上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石
康熙皇帝	〈臨董其昌書月中桂樹賦〉一卷	《寶笈三編》	未見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月中桂樹賦〉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同上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臨董其昌書月臨鏡湖賦〉一卷	《寶笈三編》	未見	康熙三十二年（1693）
康熙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月臨鏡湖賦〉	《寶笈續編》中的《淵鑑齋御筆法帖》（十冊）	同上	康熙三十二年（1693）臨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石
康熙皇帝	〈臨董其昌書庾信馬射賦〉一卷	《寶笈三編》	未見	康熙四十一年（1702）

⁴⁸ 董其昌，〈楷書大道贊卷〉，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品總目》<https://zm-digicol.dpm.org.cn/cultural/list?k=%E5%A4%A7%E9%81%93%E8%B5%9E>（檢索日期：2020年9月15日）。

⁴⁹ 董其昌，〈行書岳陽樓記卷〉，《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7/2188/img0003.xml>（檢索日期：2020年9月15日）。



作者	品名	御書臨作出處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中是否有董其昌的同名之作	備註
康熙皇帝	〈臨董其昌書竹樓記〉一卷	《寶笈三編》	未見	
康熙皇帝	〈臨董其昌書畫錦堂記〉一卷	《寶笈三編》	是，〈明董其昌畫畫錦堂圖並書記〉一卷（《寶笈初編》）	
康熙皇帝	〈臨董其昌節書月賦〉一軸	《寶笈三編》	是，《寶笈初編》	
雍正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小池賦〉	《寶笈續編》中的《朗吟閣法帖》	未見	
雍正皇帝	〈世宗憲皇帝御筆臨董其昌書登樓賦〉一冊	《寶笈初編》	或為〈明董其昌臨古〉一卷中的〈登樓賦〉？（《寶笈初編》）	
雍正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登樓賦〉	《寶笈續編》中的《朗吟閣法帖》	同上	
雍正皇帝	〈臨董其昌書天隱子序〉一卷	《寶笈三編》	未見	
雍正皇帝	〈臨董其昌天隱子序〉一冊	《珠林初編》	未見	
雍正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天隱子序〉	《寶笈續編》中的《朗吟閣法帖》	同上	
雍正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東觀餘論〉	《寶笈續編》中的《朗吟閣法帖》	未見	
雍正皇帝	〈御臨董其昌書懷素自敘帖〉	《寶笈續編》中的《朗吟閣法帖》	未見，但董其昌曾多次臨懷素（活動於八世紀中末葉）〈自敘帖〉，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有多件；東京國立博物館亦藏一件董其昌〈臨懷素自敘帖卷〉	
雍正皇帝	〈臨董其昌雲笈帖〉一卷	《珠林初編》	是，《寶笈初編》	

雍正皇帝留下的書作數量不多，遠遜康熙帝、乾隆帝。依《四宜堂法帖》（表1不列《四宜堂法帖》，因其中無任何臨仿之作，全為雍正自書）乾隆皇帝跋：「曰《朗吟閣法帖》者，潛邸所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⁵¹可知表1所列的出自《朗吟閣法帖》的雍正臨作書於潛邸時期，即康熙帝在位之際，故《朗吟閣法帖》內雍正曾臨過的董其昌（款）原帖不見蹤跡，仍極有可能與康熙有關。

由表1可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中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曾臨過的許多董其昌（款）原作，似乎在今日現世的清宮舊藏中未見，且在成書年代與二帝御筆臨書時間相去不遠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的記載中亦難以尋得。鑑於我們難以完全確認康、雍二帝的臨書來源，故無法藉以肯定這些失蹤的原作就是被拆毀。或有可能臨書來源為刻帖，而非墨蹟收藏。不過，登錄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系列書中的清宮法帖收藏極少，而且不見有董書刻帖。

⁵⁰ 何國慶主編，《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藏：董其昌與松江書派精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頁38-103。東京國立博物館畫像檢索，董其昌，〈臨懷素自敘帖卷〉。

⁵¹ 容庚，《叢帖目》，冊4，頁1695。

我們不能排除這些消失的作品僅是被剔除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之外，或只是在編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前被賞賜出去或佚失等。然而，從現有的資訊來看，極可能有更多董其昌（款）作品被康熙皇帝拆毀後未再拼合，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

（三）與《書種堂續帖》比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正文〈古詩〉部份的原始情況可大略見於董其昌書，萬曆四十五年（1617）由其姪孫董鎬摹勒完畢的《書種堂續帖》的卷四當中（圖 33）。不過，《書種堂續帖》對原作中一部份古詩的字距作了調整，並非完全以原貌上石。⁵²

由《書種堂續帖》卷末的董鎬篆書款題可以看出董鎬對結字的掌握並不高明，且絕非僅是因為年代久遠而使得石刻筆劃漫漶，轉折被時光磨去稜角。目前《書種堂續帖》的拓本瀰漫著一種溫弱猶疑的氛圍，原作中董其昌展現的米芾「無往不收」的筆法，到了《書種堂續帖》中，不是矯枉過正便是過猶不及（圖 34）；其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有的連筆（圖 35）、帶筆（圖 36）、飛白（圖 37）等高妙之處也未刻出。儘管《書種堂續帖》與故宮本有一些細節上的差異，由二者字形間架結構上的高度相近，筆者仍判斷故宮本應即《書種堂續帖》卷四據以上石的原墨蹟本。

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中被裁成整行長條狀，非單字碎塊或短條相接的部份來看，筆者發現《書種堂續帖》上石時略調整過上下字距，但改動不算太大，仍維持原作的一行九至十二字左右；而〈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等部份古詩，在《書種堂續帖》中則大致保留了原作的上下字距（圖 38）。⁵³

除此之外，《書種堂續帖》一開的高度約為 26 公分左右，與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本幅的 25.1 公分大致相同，想是董鎬為了上石摹勒的方便，擇取了或裁割出相近高度的石材。錄《書種堂續帖》卷四中的〈古詩十九首〉的董其昌後跋釋文如下（〈古詩〉部份釋文文長，暫略不錄）：

甲寅（1614）中秋，舟次焦山，書〈古詩十九首〉。倣褚河南〈哀冊〉。其昌。

《書種堂續帖》卷四末尾另附一段相關跋語及〈董其昌致董鎬尺牘〉一通，內容釋文如下：

1. 《書種堂續帖》卷四後附相關題跋（圖 33-13~ 圖 33-14）

余曾書〈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之為十九體，山東許尚寶一本，新安門生方胄子亦一本，與此而三。但此本不用各體，似無忘羊歧路耳。其昌自題。

2. 〈董其昌致董鎬尺牘〉（圖 33-14）

久為秋暑不能把筆，來絹已寫〈赤壁〉，而宋藏紙則書〈古詩〉矣。並附去。人還可亟出門，約以九月初至，尚可相待，過此則匆匆無暇耳。新刻《書種帖》多多帶來，此間頗有去路也。人參領到，謝謝。叔翁其昌頓首。彥京姪孫。八月十七日。揚州。⁵⁴

⁵² 《書種堂續帖》資料，一參容庚，《叢帖目》，冊 3，頁 1239-1243。《書種堂續帖》稀見，容希白先生博覽群帖，亦僅見第一、二、六卷。誠摯感謝臺南謙受堂主人康益源先生允可拍攝第四、五、六三卷的圖像。

⁵³ 這兩首古詩基本上保存了原作的上下字距，但行寬是否經過改動則未知。既然《書種堂續帖》的字距經過調整，那麼亦未必忠實呈現原作行寬。

⁵⁴ 《書種堂續帖》釋文為筆者自釋。

上引《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的「甲寅中秋」後跋，與〈董其昌致董鎬尺牘〉內容及日期相互呼應，兩相對照後可知〈董其昌致董鎬尺牘〉寫於「甲寅」（1614）中秋後二日，且董其昌一併將在中秋節以藏經紙所書的〈古詩十九首〉，和同年秋日以絹布書寫的〈赤壁賦〉隨信附寄予董鎬（大概是為了囑託他摹勒上石）。而董其昌寫作此信札之時，董其昌書、董鎬摹勒的《書種堂帖》新刻完成。⁵⁵

《書種堂續帖》曾經董其昌生前審定，其中所收董書必為真蹟。那麼，《書種堂續帖》中〈古詩十九首〉的主體〈古詩〉區段字形結構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幾近完全相同，然而詩後作者自跋兩歧，一為「甲寅」（1614），一為「乙卯」（1615）。因「甲寅」、「乙卯」僅相隔一年，似乎不太可能是董其昌書寫「乙卯」跋時，誤記或誤計曾寫過的〈古詩十九首〉數量。此矛盾究竟何解？難道故宮本的「乙卯」跋為贗嗎？故宮所藏〈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現狀是由許多紙塊拼接而成，「乙卯」跋所在紙張與正文〈古詩〉部份之紙不連續，中間存在接縫（圖39），無法由此確認「乙卯」跋是否即故宮本原跋。

以下分論兩種可能狀況，筆者傾向第二種較為複雜的情形才是正確的。

第一種狀況：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上乙卯年（1615）題跋為偽，故宮本全卷實書於甲寅年（1614），則真跋為上引「甲寅中秋……」，乙卯年跋上所提供的所有資訊視為錯誤訊息，忽略不計。可推得所謂「與此而三」的「此」，即第三本，即甲寅本，就是故宮本，不用各體（亦即不用各家書風，只用褚遂良（597-658）〈哀冊〉書體），紙質是宋藏紙（應指金粟山藏經紙）。

第二種狀況：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乙卯年（1615）題跋為真蹟，則「乙卯」跋上所提供的訊息亦為真。加入「乙卯」跋的資訊與上引《書種堂續帖》三段題語交互參照，則《書種堂續帖》後的「余曾書……似無忘羊歧路耳」這一段，顯然是呼應本文第二節討論的主體——作於1610年，後贈給方胄子（方季康），今藏地不明的「冊頁本」後跋的「勿走忘羊路如予也。」因此，董其昌寫下這段跋語的時間必定在「冊頁本」創作之後。又，故宮跋已言明第三本不是宋藏紙，鑑於已知「甲寅」、「乙卯」兩本都是宋藏紙，故第三本應是故宮本題跋中提及的「絹書」。

所以，若「乙卯」跋為真，為了解釋加入「乙卯」跋的資訊後產生的矛盾，可以推得：

1. 甲寅本墨蹟曾附寄給董鎬摹勒上石，可能後來又被捨棄。筆者認為或許董其昌滿意甲寅本題跋更甚乙卯本，所以單取甲寅本題跋合併乙卯本正文上石。
2. 上引「但此本不用各體」的「此本」並非指《書種堂續帖》所收錄的〈古詩十九首〉，而是另一件董其昌書寫的第三本〈古詩十九首〉，《書種堂續帖》僅是將相關題跋併於一處上石。對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後跋資訊，推得董其昌所書的第三本〈古詩十九首〉為絹本，不用各體書風（或有可能為王羲之（303-361）書風），書寫時間落於第二本的1610年陰曆九月十一日至第四本1614年的中秋節之間（參見後文表2的統合）。
3. 第四本〈古詩十九首〉是甲寅本，金粟山藏經紙，用褚遂良〈哀冊〉書風，可能後來被捨棄。
4. 第五本（因第四本被捨棄，此本的序數後來被董其昌本人計作第四）是乙卯本，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金粟山藏經紙，同樣使用褚遂良〈哀冊〉書風。

的確，若將「乙卯」跋直接視為假跋，問題與推論都相對單純。何以筆者傾向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上的「乙卯」跋為真的第二種較為複雜的狀況？首先，最重要的直接證據是書風以及書法水平，「乙卯」

⁵⁵ 尺牘內提到的《書種帖》即指《書種堂帖》，此帖的完成時間的確是甲寅年（1614），帖末有董鎬篆書款題二行：「萬曆四十二年，歲在甲寅八月既望，姪孫董鎬勒石。」見容庚，《叢帖目》，冊3，頁1239。

跋從書風及水平來看，落於董其昌真蹟應有的合理範疇。又，若仔細放大檢視，「乙卯」跋的確是一次寫成，並無任何雙鉤填墨或描補痕跡，且與可確定為董書真蹟無疑的正文〈古詩〉部份紙質、紙色相仿。

另外，甲寅本、乙卯本皆選用褚遂良〈哀冊〉書風，筆者合理懷疑董其昌刻意重新以同樣的〈哀冊〉書風書寫乙卯本，便是為了取代甲寅本來摹勒上石。可能由於刻帖傳之久遠，故董其昌揀選墨蹟上石相當謹慎，反覆書寫，力求盡善盡美。正文〈古詩〉部份，或許作者董其昌本人更為滿意乙卯年的創作；而跋文區段董其昌則偏好甲寅年所書的較早版本。

可作為旁證的是「乙卯」跋傳達出太多資訊，由於言多必失——題跋所提供的資訊愈複雜愈易從文獻史料的角度鑑定真偽。一般而言，除了直接擷取自原作者文集或其他真蹟的情形外，作偽者傾向製作內容較為單純的跋文，不願耗費工夫爬梳材料，所以假跋一向不具備太多有意義的訊息。董其昌書法贋品最常見的偽跋是僅落名款「其昌」，或「其昌」加上年款，抑或增添其他不涉明確足堪考證的人、事、時、地、物的空泛文句。日後若前述第二節討論過的「冊頁本」實體現世，確為高麗繭紙，還有若「絹本」、「甲寅本」露面，可進一步得出更精確的結論。

另外，此卷末尾部份「以膠投漆中」的「漆」字上有一頭部殘斷的「金粟山藏經紙」印，往右二行在「故人心尚爾」的「心」右方能夠尋得此印短缺的頭部。兩截斷印經接圖後，確可合而為一（圖 40）。「金粟山藏經紙」即《石渠寶笈三編》此卷條目所稱之「金粟牋」，與「乙卯」跋所言「此則宋藏紙」相符。⁵⁶而且今日所見董其昌墨蹟面（即原金粟山藏經紙反面）隱約透出反面（即原金粟山藏經紙的正面）存在字跡（圖 41）。不知若以科學檢測透視背面經文，是否能夠以重拼經文的方式，略窺得作品最初的原貌？

（四）卷面歷經三次改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的卷面狀況複雜，很可能曾歷經如下所列的三次改動，且改動應皆發生於康熙朝（1662-1722；關於改動時間的推斷，可參第六節「其餘二件被拆解的董其昌作品」）。

1. 第一階段（在原作者董其昌處至流入清宮進行第一次改動前）：原作、長卷本

此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大致呈現董其昌原作完成時的原始樣態，並未經過重大改動。很可能是在康熙朝（1662-1722）由於康熙皇帝對董書的好尚被蒐羅入清宮。

以〈古詩十九首〉的詩文內容長度，以及董其昌所拿到的書寫用紙為已有抄經的金粟山藏經紙經卷評估，可推知原作很可能為長卷。

今日的紙背（即原金粟山藏經紙正面）顯然存在經文，而今日的墨蹟面，因是藏經紙的反面，原來必無朱絲界欄，所以界欄顯然為後加。由現在卷面上出現無界欄、單界欄、雙界欄，各行行寬又有顯著差異等混亂狀況，可知此作必不只打過一次朱絲界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應是在完全未拆，保留原作狀況的此階段，被首次打上朱絲欄。但以現存卷面狀況，無法確知第一次界欄究竟是董其昌本人或其後輩、僮僕所打，或是進入清宮後才被添畫的。行一的標題「古詩」與行二「行行重行行」之間未被裁斷，保留了一條界欄（圖 42），可能即第一次所畫的朱絲欄。

2. 第二階段（第一次改動後至第二次改動前）：碎塊

⁵⁶ 關於「金粟山藏經紙」印、金粟箋的討論，可參見何炎泉，〈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兼論其對古代箋紙的賞鑑觀〉，《故宮學術季刊》，33 卷 1 期（2015 秋），主要在頁 343-348；另參（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079，頁 318。

此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發生了首次重大改動，即原始長卷被康熙皇帝拆解、割裂。畫心許多字與其界欄分離，成為不含界欄的字條、字塊。

3. 第三階段（第二次改動後至第三次改動前）：十開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應在康熙時期發生了第二次重大改動，即第一次重新裝池——重拼碎塊為十開冊頁。由殘餘的朱色雙重界欄與邊框框線（圖 43）在今日故宮本上為固定間隔出現，可知其必曾被裱褙為十開冊頁。整理故宮本在第三階段的十開冊頁時的各開內容及字數如下；由各開極大的字數差距，即可看出原始行氣與布局幾乎已被完全破壞。

第一開（共 82 字）：標題「古詩」（2 字）、〈行行重行行〉（80 字）。

第二開（共 130 字）：〈青青河畔草〉（50 字）、〈青青陵上柏〉（80 字）。

第三開（共 150 字）：〈今日良宴會〉（70 字）、〈西北有高樓〉（80 字）。

第四開（共 120 字）：〈涉江采芙蓉〉（40 字）、〈明月皎夜光〉（80 字）。

第五開（共 170 字）：〈冉冉孤生竹〉（80 字）、〈庭中有奇樹〉（40 字）、〈迢迢牽牛星〉（50 字）。

第六開（共 160 字）：〈迴車駕言邁〉（60 字）、〈東城高且長〉（50 字）、〈燕趙多佳人〉（50 字）。

第七開（共 90 字）：〈驅車上東門〉（90 字）。

第八開（共 100 字）：〈去者日以疎〉（50 字）、〈生年不滿百〉（50 字）。

第九開（共 170 字）：〈凜凜歲雲暮〉（100 字）、〈孟冬寒氣至〉（70 字）。

第十開（共 136 字）：〈客從遠方來〉（50 字）、〈明月何皎皎〉（50 字）、作者董其昌「乙卯十月朔」題跋（36 字）。

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上頭身分離的「金粟山藏經紙」印可合而為一，及一些僅有界欄的紙條和空白紙塊的紙色、紙質與某些含字紙塊相似，很有可能在原卷上即為鄰近區段（故應非另取他紙裁剪以作修補之用）。但卷面仍有一些區域出現了異常緊密的行距或字距，未配上原有的左右界欄或兩字之間應有的空白紙塊。可推知在第二階段被拆解出的不含字碎片在此階段仍留存著，但並未全部拼合到現在所見的畫心之中。

由幾處界欄在字之上（圖 44）的層位疊壓關係，以及卷面上許多行字的左、右邊緣都有界欄，且各行寬窄不一等狀況，可推知此時期應以朱色重描、加粗一部份舊界欄（圖 45），以較粗的朱色線新畫一部份界欄，並在各開新畫朱色邊框。然而，何以有一些區段完全未出現界欄仍難以索解。

此次的重拼與重新裱褙，無視行氣、章法、行距，目的僅是拼湊出大小大致相同的十開冊頁，且每開末尾須恰是一首詩的結束處。至於何以不直接拼回長卷？或可能是為了臨寫時的便利。因冊頁翻動容易，尺幅大小也較長卷更符合臨習時的視野需求。

4. 第四階段（第三次改動後至今）：將各開冊頁重新連接的長卷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應亦在康熙時期發生了第三次重大改動，即第二次重裱，由十開冊頁重接回長卷。

在第三階段時各開具有的朱色邊框線，為了重裱回長卷形式，在此階段的第二次重裱中作了適度的調整與隱藏，並在畫心外緣增添很可能是為了添補畫心天地的紙色相近的「邊框」紙（圖 46）。由於故宮本可能在重拼碎塊時保留的天、地便不足，加以又在康熙皇帝長年臨習下持續受損，導致此時畫心上

下邊界過於貼字，若不補天、地，會使得各行頭尾過於頂「天」立「地」。仔細檢視會發現「邊框」紙與畫心相接處有深色重影，二紙在邊緣處重疊，或可能「邊框」尚兼具一部份距條功用。另外，最外沿的深棕色紙（圖 47）似為覆背。

五、其他董其昌〈古詩十九首〉

明末蔣臣（1597-1652）《無他技堂遺稿》中有〈跋董玄宰所書十九首〉：

先生嘗稱元章欲作「無李論」意以自況，頃余從都下所見先生書，何至三百本！然真者亦僅三本，其一為衲子師智所藏，作張顛筆法；一藏於柏鄉魏氏，彷彿柳誠懸；一即此卷，余同年白旋吉藏也。旋吉自言其尊公掌銓時，有甚德於公者，數致報瓊之思，公未嘗一顧。晚居林下，其人終不能自己，始以此卷見寄。重違其意，乃受之。以此想見先輩流風，令我有借乘闕文之歎。而此卷時心手俱懈，忽於意到，便作游龍驚□之勢，自謂以右軍筆意為之，當是無心逗出，欣然□□□非有意揣合也。⁵⁷

蔣臣所言「十九首」應即〈古詩十九首〉。由上引段可知此董其昌所書〈古詩十九首〉，以王羲之筆意書之，為蔣臣同年白旋吉所收藏，且白旋吉的藏品是他人贈予其父的。由「其尊公掌銓時」，可知白旋吉父親曾任職吏部。此卷筆者僅見於文獻記載中，未見存世墨蹟。

蔣臣為安徽桐城人，於崇禎年間（1628-1644）舉賢良方正。筆者查閱《桐城縣志》，發現有一人名白瑜，字瑕仲，與蔣臣並列於《桐城縣志》「選舉表」之中。⁵⁸ 因此，白瑜很有可能即《無他技堂遺稿》中的「白旋吉」。另見《無他技堂遺稿》中的〈廣莫園記〉：「……欣然有會，為赴余同年白旋吉雞黍之期，流連旬日，繞澧城而園者樓閣相望。太僕象先公，旋吉從父也。」⁵⁹ 可知「白象先」為白旋吉從父，官職為「太僕」。「白象先」何許人也？筆者依河南北和出土的〈明中大夫晉階正三品東昌府知府前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和衷白公（鯤）墓誌銘〉、〈明晉階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太僕寺卿象先白公合葬墓誌銘〉，知白鯤（1552-1632）生二子，長子白太初（主要活動於十六世紀末，字易先）；次子白太始（1580-1638，字象先），曾任太僕寺卿。⁶⁰ 因此，可推得「白旋吉」為南和白氏家族的一員，可能名白瑜，字瑕仲，號旋吉。

至於白旋吉父親的身份，由南和白氏、曾任職吏部、與白象先同輩等線索推敲。據明代劉榮嗣（1570-1638）〈明賜進士太常寺卿華池白公墓誌銘〉：「庚申（1620）與華池白公以畿南隸，先後司銓。」得知白儲昭（?-1629）為河北南和人，與籍貫為河北曲周的劉榮嗣同屬「畿南」地區人，且與劉榮嗣先後任職吏部，有可能即白瑜之父。⁶¹ 又，白鯤一房的姓名自「鯤」往下，子輩有「太初」、「太始」，

⁵⁷ □為缺漏字，目前筆者取得的所有版本《無他技堂遺稿》皆為康熙四十九年刻本，全有版心部份殘破、缺字問題。依文意來看「游龍驚□」，應為「游龍驚鴻」。參見（明）蔣臣，《無他技堂遺稿》，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安徽：黃山書社，2016，據清康熙四十九年蔣于涓刻本影印），輯5冊69，卷15，頁53。

⁵⁸ 據（清）廖大聞等修；（清）金鼎壽纂，《桐城續修縣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所收原據善本掃描檔，清道光七年修十四年刻本，卷7，〈選舉表〉，頁60。

⁵⁹ （明）蔣臣，《無他技堂遺稿》，卷8，頁3。

⁶⁰ 〈明中大夫晉階正三品東昌府知府前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和衷白公（鯤）墓誌銘〉，收錄於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冊上，頁338；冊下，頁320-322。〈明晉階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太僕寺卿象先白公合葬墓誌銘〉，見同書冊上，頁347；冊下，頁333-335。

⁶¹ 白儲昭卒年，依劉榮嗣〈明賜進士太常寺卿華池白公墓誌銘〉有「己巳（1629）卒於里，識者傷之」句。參閱（明）劉榮嗣，《簡齋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清康熙元年劉佑刻本影印），集部冊46，文卷之4「誌銘」，頁38-43。現行文獻多作白儲昭1627年卒，筆者認為1627年的說法大抵來自〈明太常卿白儲昭傳〉：「丁卯（1627）推撫寧夏，忠賢矯旨，以負氣偏執落職，會上御極，薦剡滿公車，業以倉場侍郎登啟事，竟卒於家。」然而，依文意來看「丁卯推撫寧夏」與「卒於家」間應有一段時間差。此外，依〈明太常

孫輩名為「抱一」、「得一」、「還一」等，可知這一房的取名規則與道家相關聯；⁶² 而白「瑜」、白儲「珫」，及白儲珫之父白「琦」之名皆有玉字偏旁，應為同一房。⁶³ 另，白儲珫與董其昌皆曾任職於太常寺，白儲珫在天啟六年（1626）任太常寺正卿，董其昌在天啟二年（1622）任太常寺少卿。⁶⁴ 縱使我們無法證實白儲珫與董其昌曾有直接交遊，但兩人皆是同時期的明代高級官員，白儲珫對董其昌的書風必然有一定認識，甚至習見董書真蹟。因此，南和白氏家族所藏董其昌〈古詩十九首〉為真蹟的可能性偏高。

以下為筆者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乙卯」跋為真的前提，依據前述文獻及董其昌各題跋所得資訊，統整董其昌曾書的幾件〈古詩十九首〉如表 2。粵博藏本狀況不明，而上述南和白氏舊藏僅見於文獻中，此二件真偽未知，暫列「其他」，存疑待考。

表 2：董其昌（款）〈古詩十九首〉整理

書寫順序	作者	受書者	材質	書體	年代	藏地	狀況
1	董其昌	山東許維新	高麗繭紙	諸家書體			僅見於文獻中
2	董其昌	新安方季康	高麗繭紙	諸家書體	1610 年陰曆九月十一日 1610 年陰曆十月十五日題贈方季康	不詳（即前述「冊頁本」）	墨蹟本
	宋珏		絹	諸家書體	可能為 1614 年	上海博物館	墨蹟本 臨本（臨書來源為序號 2 的「冊頁本」）
3	董其昌		絹	不用各體	介於序號 2、4 之間		僅見於文獻中
4	董其昌	交由董鎬摹勒上石	金粟山藏經紙	做褚遂良〈哀冊〉	甲寅（1614）中秋節		題跋見於《書種堂續帖》
5	董其昌	交由董鎬摹勒上石	金粟山藏經紙	做褚遂良〈哀冊〉	乙卯（1615）陰曆十月初一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	墨蹟本
其他	應為董其昌真蹟		或有可能即序號 3 的絹本	王羲之筆意		南和白氏舊藏	僅見於文獻中
其他	真偽存疑		紙			廣東省博物館	墨蹟本

卿白儲珫傳〉：「丙辰（1616）除禮部主事，戊午（1618）改吏部。」可確認白儲珫的確曾任官吏部。參（明）曹履泰，〈明太常卿白儲珫傳〉，收入（清）周章煥纂修，《南和縣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所收原據善本掃描檔，清乾隆十四年鈔本，卷 11，頁 26-27。

⁶² 白鯤一房的姓名依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冊下，頁 320-322。

⁶³ 白儲珫之父名白琦。見（明）曹履泰，〈明太常卿白儲珫傳〉，收入（清）周章煥纂修，《南和縣志》，卷 11，頁 26。

⁶⁴ （明）不著撰者，《太常續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599，卷 7，頁 58、71。〈明太常卿白儲珫傳〉有「陞太常寺少卿」、「晉太常寺卿」句，依小傳中的先後時序來看，應發生於 1625、1626 年。參見（明）曹履泰，〈明太常卿白儲珫傳〉，收入（清）周章煥纂修，《南和縣志》，卷 11，頁 27。

六、其餘二件被拆解的董其昌作品

以下分述另二件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曾遭嚴重拆解又重裝的董其昌作品的現況。

（一）〈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釋文：

（第一則）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見，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樽裏。

（第二則）遠公愛康樂，為我開禪關。蕭然松石下，何異清涼山。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閒。一坐度小劫，觀空天地間。

（作者自識）書太白〈把酒問月〉，紙有餘地，以〈山池詩〉足之。為雲升老親翁。時有金陵之行，舟中為別。辛未（1631）中秋日。其昌。

這件作品與前述「冊頁本」中仿李北海（李邕，678-747，曾任北海太守）筆意的〈東城高且長〉段類似（圖 48），帶有一種董其昌所詮釋的李北海書風。款題中「雲升」即董其昌友人華亭人沈猶龍（?-1645，字雲升）。

此作乾隆五璽俱全，可知此冊與〈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同樣曾入《石渠寶笈續編》又被剔除，後入《石渠寶笈三編》（乾清宮十一）。⁶⁵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康熙帝臨作，可知此作最晚在康熙朝（1662-1722）已入清宮收藏。

此作較下方的另一件討論主體〈崔瑗座右銘冊〉切割程度更甚，幾乎字字分離。許多紙塊錯位，使得章法、行氣極為弔詭（圖 49），相鄰紙色也有差異（圖 50），甚至有些紙塊根本未能平整拼合，反倒在邊角處與相鄰紙片重疊（圖 51）。

此作為經摺裝冊頁，品相不佳，封面磨損，整冊霉傷、水漬嚴重，且多字因受潮、霉霜呈現剝落缺損（圖 52）狀態。由現存紙面上的墨痕及污漬等的連續或斷裂（圖 53），可以看出髒污與霉斑或有在被拆解前，或有在被拆解之後留下的；甚至在「月光常照金樽裏」的「光」字有某物蘸墨的押印（圖 54）等，故可知此作在被拆分前後都被頻繁使用。各開中心偏下區域霉斑猖獗，有可能是由於此位置是伸手進入翻動經摺裝冊頁時最容易碰觸之處。以上種種線索，都顯示此作曾被長期作為字帖臨習使用。

現存〈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紙面上同時存在不明顯的橫向與縱向斷裂紋，因此難以從摺斷狀況判斷拆解前的原裝裱情形究竟是橫卷、立軸抑或其他。不過，由現在畫面凌亂的行氣與不合理的佈排觀之，想必與原初大相逕庭。一般臨書常見將立軸臨成立軸、橫卷臨為橫卷，由於可以直接模仿原作的行氣安排，不需花心思重新佈局，是最容易的臨仿方式。因此，從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康熙帝御臨之作的形式為立軸，筆者猜測〈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或有可能原為立軸。

（二）〈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筆者發現的第三件遭到拆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是〈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作品釋文如下：

⁶⁵（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076，頁 20。另參考王崇齊，〈《石渠寶笈三編》相關印記的鈐押〉，頁 79。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重，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崔子玉座右銘。董其昌書。

此作入《石渠寶笈》（初編）：

明董其昌書座右銘一冊。次等景三。朝鮮鏡光牋本。行書。款云：「崔子玉座右銘。董其昌書。」冊。計十四幅。

細觀這件作品，若獨立審視個別字，字字都寫得極為傑出。與前述董其昌向他人書風致敬之作不同，是標準的董其昌本體字。然而，在此作中，許多無字的空白紙塊和前二件被拆解的作品相同，被任意填補在畫面上，使得行氣極為不自然（圖 55）。

此冊頁為經摺裝，多處有霉傷、水漬、髒污等。此種程度的傷損絕不單純是歲月侵蝕，主要應來自使用者日常中反覆地臨習、使用與展翫。各開中縫的污漬、霉變最嚴重，有可能是長期翻動時的手部分泌物所致。作品上還出現許多墨痕，似曾長期被作為字帖臨習使用（圖 56）。

此外，這件作品上留有諸多摺斷痕。然而，一部份痕跡的位置太巧，恰在二字之間、色深且偏細，筆者認為應是摺痕（圖 57），若為自然劣化的斷裂痕必定會比摺痕更寬粗。因此，筆者目前傾向現存摺斷痕一部份源於頻繁開收的自然斷裂，一些則是拆分裁下後，為了集字與臨習的方便刻意摺出。這些摺痕似也部份解釋了何以不須整幅作品所有字皆裁成字字獨立，即可滿足集字需求。

如果〈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一開始即為冊頁，沒有理由存在大量摺斷痕，可推知冊頁絕非最初的裝裱形式。一般自然斷痕方向會大致平行天桿、地桿，若此作原為橫卷，現今紙面上餘留的斷痕應大略平行各行垂直中軸，然則並非如此。因此，由斷痕的方向為橫向，可推知〈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應原為立軸。

又，檢視此經摺裝冊頁各開上污漬，會注意到在無字的 A1、B1 開副葉的巨大淺褐色「山形髒污」（圖 58），亦同時出現在其他各開（參前述圖 30），且各開上此「山形髒污」無被切斷的不連續現象。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其他多開上「山形髒污」以外的許多污漬霉傷有不連貫、邊緣明顯（圖 59）的情形，顯見它們是在本作被拆解成字塊之前便存在，而「山形髒污」必然發生於拼合重裱為冊頁之後。從「山形髒污」的顏色來看，應非白水，大抵是茶水；且此「山形髒污」形狀對稱，代表是冊頁收合之時被潑濺上去的，故能夠推知此作在重新裝池後，遭遇了茶水（或其他有色液體）傾倒至冊上的嚴重污損事件。

從〈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上的許多生活、臨習痕跡，如液體翻倒的水傷、臨帖造成的墨痕；翻動時手部在冊頁中縫及下緣處餘留的手漬，經年累月後變作霉斑點點等，可知此作拆解前後皆被頻繁使用。故筆者大膽推斷〈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在康熙朝（1662-1722）拆分，重新拼合及重裱仍發生於康熙時期。

康熙時期名臣趙申喬（1644-1720）所著《趙恭毅公剩稿》中記載了康熙皇帝曾賜予他一件御臨「董其昌所錄崔子玉座右銘」——此作可能是康熙帝在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一年，1702）途中所臨（也不能排除是早已臨好，再攜帶以備賞賜之用）。康熙帝曾自言：「朕此番巡幸別無他事，每日惟有看書寫字而已。」此御臨之作在南巡途中暫交當時的山西臨汾縣知縣、趙申喬次子趙鳳詔（?-1718），後轉賣至趙申喬手上，後勒石建亭供奉。在乾隆時編纂的《欽定皇朝通志》中的「金石略」部份雖列出了許多康熙帝賞賜趙申喬的御書，但未見任何與「崔瑗座右銘」相關的記載。趙申喬所立的御書石刻或被《欽

定皇朝通志》漏記，或在乾隆時已不存或漫漶。⁶⁶

董其昌應曾多次書寫〈崔瑗座右銘〉，除本冊外，《石渠寶笈》中還錄有數件（真假暫且不論）。⁶⁷此外，由董其昌所書，陳鉅昌（活動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中期以前）所摹勒的《延清堂帖》（董其昌生前審定，所收必為真蹟）卷四有「〈無道人之短〉等五、七言詩十二首」，其中〈無道人之短〉五言詩，或即指〈崔瑗座右銘〉。⁶⁸因此，雖無法確定康熙帝賜予趙申喬的御臨「董其昌所錄崔子玉座右銘」，所對應的董書原蹟具體為哪一件，究竟是否即本段的討論主體，但無疑康熙南巡時攜帶了一些作為臨習之用的作品，其中或可能包含了董其昌所書的某件〈崔瑗座右銘〉。

（三）三件作品的拆分及重裝皆在康熙朝

如果將以上談及的三件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曾被拆毀的董其昌作品視為相連帶的關聯之作，則若其中〈崔瑗座右銘〉的拆分及重拼、重裝，確實發生於康熙朝（1662-1722），則極有可能三件作品皆是如此。縱使我們無法完全排除其他清帝在位時才拼合的可能性，但以這三件作品被拆散的零碎程度，要留待到康熙之後的皇帝當政時再拼合，似乎有一定難度。而且，從今日三件作品皆被粗糙地裁開成碎片，又都有紙塊錯位的情況來看，三件作品在拆分前應未詳細記錄原始情形，以備後來重裝。

筆者查閱《活計檔》，在「乾隆三十七年各作成活計清檔」中尋得一則相關記載：

[行文] (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十一月)

初一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十月初二日首領董五經交〈董其昌古詩十九首手卷〉一卷。傳旨著交啟祥宮作匣，配袂、擎樣子，發往南邊，依前作法照樣做來。欽此。

於三十八年閏三月初八日，庫掌四德、五德、筆帖式福慶，將蘇州送到玉擎、錦袂各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交如意館。訖。⁶⁹

檢視登錄清宮收藏的《石渠寶笈》（初編）、《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三編》，會發現僅《石渠寶笈三編》中錄有一件〈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即本文的討論主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⁷⁰因此，上引《活計檔》中「董其昌古詩十九首手卷」應即故宮所藏〈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由上引文可

⁶⁶ 趙申喬：「今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二十二日，臣男山西臨汾知縣臣趙鳳詔祇領皇上駕幸五臺行宮頒賜臣御書一卷，轉賚到浙，臣隨率所屬文武各官，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受啟封敬覽，乃臨董其昌所錄〈崔子玉座右銘〉。」參見（清）趙申喬，《趙恭毅公剩稿》，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本，卷1，〈恭謝天恩領到御書疏〉，頁1。趙申喬：「皇上御極之四十一年（1702）春二月十有二日，西巡駐蹕五臺。臣男山西臨汾知縣臣趙鳳詔接駕行宮，召見獎賚踰分。特賜臣申喬御書一卷，命臣鳳詔轉賚到浙。臣隨率屬出郭跪迎至署，叩頭祇受，訖，盥手敬啟重封，然後敢讀。乃臨董其昌所錄〈崔子玉座右銘〉也。」參見（清）趙申喬，《趙恭毅公剩稿》，卷4，〈恭記御書座右銘碑後〉，頁8。趙熊詔：「上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恭摹勒石，建亭供奉，時瞻誦以自警。」參見（清）趙熊詔，《趙裘萼公剩稿》，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本，卷2，〈先考戶部尚書諡恭毅松伍府君暨先妣龔夫人行述〉，頁6。另參（清）清高宗撰，《欽定皇朝通志》，卷115-121。

⁶⁷ 例如《石渠寶笈》中尚有一件宣德鏡光箋本、一件宣德箋本。參見（清）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石渠寶笈》（初編），卷26，〈御書房十〉，頁1；卷37，〈重華宮七〉，頁7。

⁶⁸ 容庚，《叢帖目》，冊3，頁1231。

⁶⁹ 中研院近史所藏一史館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全文：<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0:0:1:hjta ng@@@0.2240362935920578>（檢索日期：2020年09月15日）。另參《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5，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行文〉，頁480-481。

⁷⁰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079，頁318。

知故宮本的別子（今已佚失）原為玉質，由南邊的蘇州造辦處所製作，包巾亦為蘇州造辦處所配。⁷¹

康熙朝（1662-1722）造辦處、御書處初立，關於活計清檔的紀錄尚未步上軌道。因此，我們無法從《活計檔》的記載中尋得上述三件被嚴重拆分的作品的裝潢紀錄。到了乾隆時期，《活計檔》的記載已相當完備，但筆者仍未見《活計檔》提及此三件曾歷經紙塊拼合等重新裝池工作，僅有上引為「董其昌古詩十九首手卷」配匣、別子、包巾的紀錄。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在乾隆朝（1736-1795）已被稱為「手卷一卷」，是否又增添了它的重拼及兩次重裝皆發生於康熙朝的可能性？

鑑於此三件作品分割的方式極度隨意，動手割裂作品者，很可能便是康熙皇帝本人。以集字方式創作作品，對於書家而言，並非光彩之事，不免須適度隱晦，可能不便尋求協助。若是命令臣子協助集字，其實有例如影摹等的許多方法，能夠避免毀壞原作；且臣下必會審慎執行上命，不該發生有個別字的筆劃末端遺落，導致後來重新裝池時須補筆的情形。又，考慮到日後的重新裝潢，臣工想必會主動記錄所裁下各字原始的位置細節。另外，除了使用者本人，其他人應難以評估哪些字需要獨立拆分，哪一部份要保留原狀，哪區段又欲拆成條塊等複雜需求。因此，若由下屬拆解，應會裁成所有字皆呈現獨立活字的均勻樣貌，恐怕不會是今日的多樣狀況。

常用漢字數量龐大，若要系統化集字，絕非一人、一時之力能夠完成，想來康熙帝應非系統性的進行集字工作，因此也不太可能建立起完整的常用漢字集字字庫。依照表 1 找出的可能被拆毀的作品（雖應仍有許多被毀作品未記入）所能集到的字量，且尚須考慮不同字體無法一同集字，似較難集出所需文本全篇。

回應本文最開始言及的康熙皇帝的「作弊」手段，筆者認為康熙皇帝的書法作品極可能採用了集字對臨的方法，而非映寫或鈎摹。原因如下：

1. 筆者沒有在康熙皇帝現世的非臨作的作品中發現字形逼肖董其昌的字，僅是帶有其筆意或風格造形；也不見疊筆、填墨或重複描摹等映寫或鈎摹會出現的必要痕跡。
2. 在以集字作為前提的情形下，由於被拆分的每件原作字體大小不一，若採映寫或鈎摹無疑將使成品各字大小參差；若採對臨則可避免如此。此外，以個人獨力集字的角度思考，進行映寫或鈎摹過於費時費工。
3. 遭拆解的三件作品上，不見有映寫時可能透過紙面沾上底稿的墨痕或重影。若直接以原書家的原稿作為映寫底本，原稿會沾墨污損，難以重複利用；若不以董其昌的原稿作為底本，而是先製作複製品或線描，則無需拆解原稿，可直接以複製品等進行其後各種運用。

若此三件作品的拆分與重裝確實皆發生於康熙時期，從現存紙面傷損來看，它們先是歷經物主康熙皇帝的日常頻繁臨習，再被裁開成碎塊，重裝後仍然被反覆使用，而非一入藏立刻被割裂集字。其上的種種痕跡作為實物證據，在在展示了康熙皇帝的勤奮學書歷程。此外，在許多文獻、圖像記載中，亦可看見豐富的康熙皇帝臨董及大量頒賜御書的記錄，可得知康熙帝習書刻苦，其中又以臨習董其昌為最。⁷²

⁷¹ 關於北京的清宮造辦處將一部份裝裱材料交與蘇州造辦處之事，可參考郭倉妙，〈乾隆時期書畫藏品的典藏與維護〉，《故宮文物月刊》，404 期（2016.11），頁 112-119。

⁷² 例如：康熙朝《起居注冊》各冊幾乎皆可見康熙帝頒賜御書的記錄，但其青年時賜御書的次數少於中老年，又以幾次南巡時賞賜記錄最多。另可見《欽定皇朝通志》中的「金石略」部份，收入（清）清高宗撰，《欽定皇朝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45，卷 115-121。《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中亦多見。康熙帝御書品目可參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叢書；康熙帝作品圖像除墨蹟外，尚可見於《避暑山莊法帖》、《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等。

茲選錄如下：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

喇沙里至懋勤殿。諭曰：「爾職任翰墨之地，特以朕所書〈聖感寺碑石刻〉一冊、倣董其昌大書一軸賜爾。」（康熙十八年（1679）十月二十六日）⁷³

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書〈華山寺碑〉，文字極大，難於臨摹，朕身臥其上，必臨摹而後已。（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初五日）⁷⁴

張玉書（1642-1711）《張文貞集》：

皇上既頒御書數百幅，分賜在廷諸臣，而御前所存者，尚積數千幅之多……伏蒙皇上頒發〈黃樹子賦〉、〈臨董其昌書〉一卷，神采煥爛，結構精警，無法不備，無體不該，實董其昌所未能到。⁷⁵

而由前述趙申喬領到康熙帝御臨「董其昌所錄崔子玉座右銘」的記載，對照同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起居注冊》，可見康熙帝接見趙鳳詔的記錄，但其中並未提及賜下的御臨之作名為「董其昌所錄崔子玉座右銘。」可知有些康熙御書事實上為臨董其昌，惟《起居注冊》等史料中未必會詳細記錄，一概泛稱為「御書」。⁷⁶ 因此，康熙帝實際的臨董書作數量，應遠比文獻記載中更為龐大。

七、康熙皇帝的錯別字

康熙皇帝的漢文書蹟中存在大批寫法存疑的字，⁷⁷ 且同一（或具有同樣部件的）漢字在其作品中竟然時正時誤，如表 3 中「離」、「籬」即為一鮮明的例子。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季冬及其前，康熙御書中可見數種「離」、「籬」的疑義造形，然而到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何以康熙帝忽然領悟了此前數十年浸淫習書皆未掌握的正確而優美的寫法？是否較雅正的字形結構存在可參照對臨的範本？表 3 中許多正確的寫法甚至早於有疑義的及錯誤的，可知並非後來才習得正確寫法。上述「離」、「籬」並非孤例，尚有常用的「蘭」、「涼」、「搖」、「綠」、「勝」、「臨」等字（參表 3）。多數漢字若能夠正確理解並記憶其基本部件，應不易反覆出錯，故很可能康熙皇帝書作內某些典正的結體存在參照來源——即本文論述核心「集字」。

一般而言，書寫時須時時掃視上下左右，以調諧整體佈局，故少字數之作中的明顯筆誤幾乎是不可能被書家所忽略的。仍以上述「離」字為例——表 3 中的第三個「離」字擷取自〈聖祖仁皇帝御筆季冬南苑詩（之十）〉（即圖 5），在作品中為首字。因此，若「離」實為筆誤，康熙皇帝可以立刻更換新紙；或在錯字右側加點以點去；或是仍持續書畢整張宣紙，但不落款及鈐蓋御寶，僅視為練習之作。顯見康熙皇帝不會察覺「離」的寫法訛謬，才會既不點掉又落款用印。

漢字由各級構形部件組合而成，縱令書法各體寫法相當多變，但無論如何簡化或變形，代表該字關鍵結構／部件的符號皆必須存在。因此，一旦習得個別漢字的組成部件，應能推得其他類似關聯字的寫

⁷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康熙朝漢文起居注冊標點整理），冊 1，頁 453。

⁷⁴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冊 17，頁 T09625。

⁷⁵ （清）張玉書，《張文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322，卷 6，〈跋御書卷後〉，頁 1-2。

⁷⁶ 參《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冊 17，頁 T09222、T09408。

⁷⁷ 康熙皇帝硃批中的錯別字問題可另參劉家駒，〈康熙皇帝的啟蒙教育——由其硃批中的錯別字談起〉。關於康熙帝御筆硃批中的錯別字，筆者管見是其硃批內一些有疑義的字尚可寬鬆地視為通同、通假、俗體字，單就錯誤比例而言較書法作品為少，或許是因其硃批多為行楷之故。

法。經過拆解為部件後，常用漢字的所需記憶量會大減。若不經分解，欲強記數千常用漢字的篆、隸、草、行、楷各體及其衍生的各種變化性寫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康熙帝的漢文書蹟多有同一部件結構搖擺不定的情形，例如表 3 中的「秧」、「映」；「歉」、「嫌」；「熱」、「熟」。或可能康熙帝對漢字結構的理解存在缺失，因此不太能夠正確地將漢字分解成其組成部件。雖然在書法藝術中，同一漢字的各體寫法多樣，然而康熙帝的許多寫法並不屬變化型，而應歸入疑義甚或錯謬。

表 3：康熙御書單字舉隅

剪字				
釋文	籬	籬	離	離
創作年份	1696	1696	約 1704	1705
出處	〈冷枚耕織圖〉	〈冷枚耕織圖〉	〈季冬南苑詩之十〉	〈蔣廷錫野菊軸〉
正確與否 △：疑義	×	△	×	○
剪字				
釋文	蘭	蘭	深	涼
創作年份	1696	1705	1696	1705
出處	〈冷枚耕織圖〉	〈蔣廷錫野菊軸〉	〈冷枚耕織圖〉	〈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
正確與否	○	×	○	×
剪字				
釋文	涼	搖	搖	綠
創作年份	約 1717	約 1682	無年款	1705
出處	〈蔣廷錫未開新荷圖軸〉	〈柳條邊望月軸〉	〈御書陳至詠芙蕖詩軸〉	〈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
正確與否	○	○（右下兩點的寫法少見）	×	×
剪字				
釋文	綠	勝	勝	臨
創作年份	無年款	約 1702	1703	約 1679
出處	〈行楷書仿米詩軸〉	〈朱子詩刻〉	〈製研說〉	〈初夏登樓臨水詩軸〉
正確與否	○	×	○	○
剪字				
釋文	臨	秧	映	歉
創作年份	1705	1696	1696	1696
出處	〈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	〈冷枚耕織圖〉	〈冷枚耕織圖〉	〈冷枚耕織圖〉
正確與否	×	×	○	×

剪字				
釋文	嫌	熱	熟	芳
創作年份	1696	約 1713	約 1715	約 1679
出處	〈冷枚耕織圖〉	〈班達里沙人參花軸〉	〈蔣廷錫佛手寫生軸〉	〈初夏登樓臨水詩軸〉
正確與否	○	○	×	○
剪字				
釋文	芳	芳	織	識
創作年份	約 1713	無年款	1696	約 1711
出處	〈蔣廷錫瓶蓮軸〉	〈御書陳至詠芙蕖詩軸〉	〈冷枚耕織圖〉	〈黃船記〉
正確與否	○	○	○	○

未能熟諳漢字結構的書寫者臨習時往往不易判斷原作的含糊、漲墨或連綿纏繞的具體寫法。因此在康熙帝的作品中，也不乏臨寫之作仍有紕漏的案例，如今藏瀋陽故宮博物院的〈行書臨董其昌五絕詩軸〉（圖 60）即為一例。此詩作文本出自杜甫（712-770）〈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其中「代」的橫畫末端上轉已能代表一點，無須再多點一點；「神」下方誤用重文符號，如此一來釋文將變成「神神武」；「馭」的馬部筆順怪異；「雄」左下結構錯誤。

康熙皇帝的墨蹟不僅水平浮動，錯別字亦非均勻分佈。大體上，書法水平與錯誤率呈現負相關，與流佈範圍正相關。書法水平較佳的作品有疑義的字也偏少，如置放在北京國子監門口的〈大學刻石〉（圖 61）、刻版刊行的〈佩文韻府序〉（圖 62）等。上版、上石的作品似有寫得較高明且較正確的傾向，但並非絕對，表 3 中依據《起居注冊》流佈範圍主要在大臣群體間的〈耕織圖〉版印本的康熙題詩部份仍有許多錯別字。⁷⁸ 若以集字的前提去解釋，或許是由於〈耕織圖〉題詩出現許多較少見的字，導致集字困難。筆者認為整體而言書法水平相對較差，且錯字偏多的作品是各種圖冊上的康熙御題（圖 63、64、65），或許是預期其他作品有機會被賞賜流佈，而題畫將收藏於清宮。

八、結論

若將集字與自運視作光譜的兩端，許多康熙皇帝的漢文書作顯然是位於光譜中間區域的，亦即僅其中一部份字的造形與寫法有所參照。康熙皇帝集字的目的應在尋找正確的字形範例以供參照，及矯正結構、提昇作品水平。而每件作品中的字來自集字的比例可能取決於該作品的使用目的，以及他是否能在「萬幾餘暇」騰出時間來進行集字活動。

董其昌的書風主宰了整個十七世紀，實踐了運腕及用筆技巧的極則。董其昌流傳數量最龐大，也發揮得最穩定的書體是小行書、小行草。雖然目前疑為被康熙皇帝拆毀的董其昌作品字體有大有小，但康熙帝顯然較無法掌握小字董書。或是出於大字格局開闊適合賞賜，或是出於天賦，縱使涉有製造集字範本對臨的嫌疑，康熙帝的許多作品仍選擇了相對較為簡易的大行楷一路的寫法。董其昌大行楷作品數量偏少，其中極具代表性的傑作是北京故宮藏〈行書岳陽樓記卷〉（前述圖 32）。董其昌本人的大字水平相對小字較為參差，且受米芾「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書論影響的抽、拉筆勢，由於動作放大，在大字

⁷⁸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冊 13，頁 T07007-008。

中更加明顯（圖 66）。⁷⁹ 然而，董其昌原作中韻律感十足的抽拉動作、靈動的筆尖技巧，以及精心安排的字形結構與章法虛實，在康熙帝的作品中都被嚴重削弱，轉向某種看似中和平正，具秩序規範，帶有富貴氣及盛世氣象，實則板滯的道路。

所謂乾隆朝（1736-1795）的「香光告退，子昂代起」，乍看意味著另一種書風好尚的崛起。不過依筆者管見，圖像作品所反映的歷史並非完全如此——乾隆皇帝書法內裡本質的「骨」，還是來自康熙書風與書學理想的影響，如北京故宮藏康熙帝倣董其昌書風的〈聖祖仁皇帝御書陳至詠芙蕖詩軸〉（前述圖 6），便與乾隆書風非常相近，尤其是二者對秩序統調的同樣刻意追求。在乾隆朝，趙子昂（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或許重新嶄露頭角，但董香光（董其昌別號「香光居士」）仍未退下歷史舞臺。董書昌盛達於頂峰之後，迎來碑學的逆反，無疑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書法史的車輪終從風神絕俗、超逸生秀的極致折返，轉而朝藝術光譜彼端的厚重質樸風格靠攏。⁸⁰

〔後記〕《書種堂續帖》藏品圖像誠摯感謝謙受堂主人康益源先生惠允拍攝與後續使用；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盧慧紋教授、陳慧霞女士、黃麗嘉小姐、高瑄鴻小姐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給予的寶貴建議與悉心協助，在此謹申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⁷⁹ 「米海岳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之咒也。」開宗明義列於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一「論用筆」卷首，顯見此書論在董其昌心中的地位。參見（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 1，頁 1。

⁸⁰ 參馬宗霍（1897-1976）《書林藻鑑》：「聖祖則酷愛董其昌書，海內真蹟，搜訪殆盡，玉牒金題，彙登秘閣。董書在明末已靡於江南，自經新朝睿賞，聲價益重，朝殿考試，齋庭供奉，干祿求仕，視為捷途，風會所趨，香光幾定于一尊矣。高宗宸翰尤精，特建淳化軒以藏《淳化閣帖》，又命于敏中摹刻上石，分錫諸王公卿，其時承平日久，書風亦轉趨豐圓，董之纖弱，漸不厭人之望，於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趙書又大為世貴。然宗趙、宗董，固自有殊。其為帖學則一也。嘉、道以還，帖學始盛極而衰，碑學乃得以乘之。」收錄於馬宗霍，《書林藻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冊 4，卷 12，頁 340。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 米芾，《寶晉英光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冊 1932。
- (宋) 蔡襄書；(明) 宋珏編集，《古香齋寶藏蔡帖》，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殘帖。
- (宋) 蔡襄書；(明) 宋珏編集；(清) 宋祖炳重訂，《古香齋寶藏蔡帖》，收入程存潔主編，《容庚藏帖》，第一百四十九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據廣州博物館藏本影印。
- (宋) 蔡襄著；(明) 徐燊、宋珏等編，《蔡忠惠詩集全編》（附別記補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天啟二年刊本。
- (明) 不著撰者，《太常續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明) 方應祥，《青來閣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163，集部冊 4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自刻本影印。
- (明) 吳兆、程嘉燧，《新安二布衣詩》，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278，集部冊 15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洪度等刻本影印。
- (明) 宋珏，〈荔枝譜〉，收入(明) 鄧慶棠輯，《閩中荔枝通譜》，卷 15，總頁碼 225-235，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1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 李流芳，《檀園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謝三賓刊本。
- (明) 徐燊，《紅雨樓集》，收入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編輯委員會編，《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冊 42-4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 (明) 許維新，《許周翰先生稿鈔》，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刊本影印。
- (明) 陳昂著；(明) 宋珏哀集，《白雲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89，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宋珏刻本影印。
- (明) 陳昂著；(明) 宋珏哀集；(清) 宋祖炳校訂，《白雲集》，宋珏古香齋藏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天啟五年重修本。
- (明) 陳昂著；(明) 宋珏哀集；(清) 宋祖炳校訂，《白雲集》，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輯 3 冊 20，安徽：黃山書社，2016，據明萬曆四十六年宋珏刻天啟五年重修本影印。
- (明) 程嘉燧，《松圓浪淘集》（附《松圓偈庵集》二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原刻本影印。
- (明) 程嘉燧，《耦耕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3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三年金獻士、金望刻本影印。
- (明) 葛一龍，《葛震甫詩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246，集部冊 12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 董其昌，《容臺別集》，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刊本。
- (明)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清初大魁堂刻本。



- (明) 董其昌，《董文敏寫古詩十九首神品》，上海：有正書局，原書無出版年，珂羅版景印本。
- (明) 董其昌書；(明) 董鎬摹勒，《書種堂續帖》，臺南謙受堂收藏。
- (明) 劉榮嗣，《簡齋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第169，集部冊4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劉佑刻本影印。
- (明) 蔣臣，《無他技堂遺稿》，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輯5冊69，安徽：黃山書社，2016，據清康熙四十九年蔣于涓刻本影印。
- (明)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癸未海虞瞿式耜刊本。
- (清) 王杰等輯，《欽定秘殿珠林續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069-10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嘉慶內府抄本影印。
- (清) 李馥，《居業堂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2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抄本影印。
- (清) 周亮工，《賴古堂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 (清) 周亮工著；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清) 周章煥纂修，《南和縣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原據善本掃描檔，清乾隆十四年鈔本。
- (清) 英和等輯，《欽定秘殿珠林三編·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075-10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嘉慶內府抄本影印。
- (清) 張玉書，《張文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2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 張玉書等纂修，《佩文韻府》，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內府刊初印本。
- (清) 張照、梁詩正等奉敕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23-8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 清世宗御製，《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 清高宗撰，《欽定皇朝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44-64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 清聖祖御書；(清) 蔣漣等奉旨模勒，《避暑山莊法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 清聖祖御製；(清) 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98-129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 葛金烺，《愛日吟廬書畫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據清宣統二年當湖葛氏刊本影印。
- (清) 葛嗣澐，《愛日吟廬書畫補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原據善本掃描檔，民國二年葛氏刻本。
- (清) 廖大聞等修；(清) 金鼎壽纂，《桐城續修縣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原據善本掃描檔，清道光七年修十四年刻本。
- (清) 趙申喬，《趙恭毅公剩稿》（附（清）趙熊詔，《趙裘萼公剩稿》），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康熙朝漢文起居注冊標點整理。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北京：中華書局，2016，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

聯經編輯部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2009，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聯經編輯部編，《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臺北：聯經出版，2015，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近代論著

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上海博物館編，《丹青寶笈：董其昌書畫藝術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冊4。

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997，冊1、8、11、13、15。

尹一梅，〈清代宮廷刻帖述論〉，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9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504-514。

尹一梅，〈《石渠寶笈》著錄的一件康熙皇帝御書拓本〉，《中國書法》，271期，2015年11月，頁187-191。

王崇齊，〈《石渠寶笈三編》相關印記的鈐押〉，《故宮文物月刊》，328期，2010年7月，頁72-8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63-67。

朱聯保編撰，曹予庭校訂，《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

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何炎泉，〈萬幾餘暇怡情翰墨——從三件院藏品看康熙皇帝書法及其書學〉，《故宮文物月刊》，344期，2011年11月，頁40-49。

何炎泉，〈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兼論其對古代箋紙的賞鑑觀〉，《故宮學術季刊》，33卷1期，2015年秋季，頁315-366。

何國慶主編，《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藏：董其昌與松江書派精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

狄葆賢著；段春旭整理，《平等閣詩話 平等閣筆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凌利中，〈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辨偽及作者考〉，《上海博物館集刊》，2005年10期，頁55-81。

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冊2、3；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6，冊4。

馬宗霍，《書林藻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張萬興，〈從起居注看康熙帝頒賜御書的政治功用〉，《歷史檔案》，2012年2期，頁85-88。

莊吉發，〈龍章鳳藻鐵畫銀鈎——康熙皇帝論書法〉，《故宮文物月刊》，111期，1992年6月，頁112-127。

莊吉發，〈翠華南幸——以康熙皇帝南巡御書留題為中心〉，《故宮文物月刊》，409期，2017年4月，頁68-79。

郭秀蘭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書法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郭倉妙，〈乾隆時期書畫藏品的典藏與維護〉，《故宮文物月刊》，404期，2016年11月，頁112-119。

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年秋季，頁199-230。

陳捷先，〈康熙皇帝與書法〉，《故宮學術季刊》，17卷1期，1999年秋季，頁1-18。

黃惇，〈明代「仿書」創作模式的出現——從祝允明到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的討論〉，收入明道大學中國國學研究所編，《尚古與尚態：元明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萬卷樓，2013，頁359-395。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5期，頁89-104。

劉家駒，〈康熙皇帝的啟蒙教育——由其硃批中的錯別字談起〉，《故宮文物月刊》，109期，1992年4月，頁26-37。

薛永年、王連起總主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北京：故宮出版社；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冊29、30。

謝麗珍，〈宋珏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

蘇雅芬，〈蔣廷錫（1669-1732）《畫群芳擷秀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古原宏伸、傅申編集，《董其昌の書画》，東京：二玄社，1981。

河井荃廬監修，《支那墨蹟大成》，東京：國書刊行會，1974，據東京興文社1937年版再版，卷5、13。

Hay, Jonathan.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Hung Wu and Katherine R. Tsiang, 311-33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網路資料與資料庫（檢索日期：2020 年 09 月 15 日）

上海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s://www.shanghaimuseum.net/> °

中研院近史所藏一史館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全文 <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0:0:1:hjtang@@0.2240362935920578> °

北京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 <https://www.dpm.org.cn/> °

東京國立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s://www.tnm.jp/> °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s://www.metmuseum.org/> °

雅昌藝術網 <https://auction.artron.net> °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painting.npm.gov.tw> °

愛如生中國方志庫 °

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 °

圖版目錄

- 圖 1 清，康熙帝，〈杜詩刻石〉。取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 67，頁 159。
- 圖 2 清，康熙帝，〈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王維詩軸〉。取自薛永年、王連起總主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北京：故宮出版社；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冊 29，頁 136。
- 圖 3 清，康熙帝，〈朱子詩刻〉。取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 66，頁 20。
- 圖 4 清，康熙帝，〈賜僧傳琬詩刻〉。取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 67，頁 182。
- 圖 5 清，康熙帝，〈聖祖仁皇帝御筆季冬南苑詩（之十）〉。取自薛永年、王連起總主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北京：故宮出版社；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冊 29，頁 132。
- 圖 6 清，康熙帝，〈聖祖仁皇帝御書陳至詠芙蓉詩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薛永年、王連起總主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合編》，北京：故宮出版社；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冊 29，頁 133。
- 圖 7 至圖 10 清，康熙硃批。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像資料庫。
- 圖 11 明，董其昌，〈古詩十九首〉「冊頁本」。前二十三開取自古原宏伸、傅申編集，《董其昌の書畫》，東京：二玄社，1981，頁 113-124；第二十四開取自河井荃廬監修，《支那墨蹟大成》，東京：國書刊行會，1974，卷 5，頁 61。
- 圖 12 明，宋珏，〈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絹本長卷，上海博物館藏。取自上海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s://www.shanghaimuseum.net/museum/frontend/articles/P00005004.html>，檢 索 日 期：2020 年 09 月 15 日。
- 圖 13 上海博物館本中的〈行行重行行〉與董其昌「冊頁本」對照。上博本出處參圖 12；「冊頁本」出處見圖 11。
- 圖 14 上海博物館本中的〈燕趙多佳人〉與董其昌「冊頁本」對照。上博本出處參圖 12；「冊頁本」出處見圖 11。
- 圖 15 上海博物館本與北京故宮藏黃庭堅〈草書諸上座帖〉中的「周元亮借觀一過」印比較。上博本出處參圖 12；〈草書諸上座帖〉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 <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8/1630/img0001.xml>，檢 索 日 期：2020 年 09 月 15 日。
- 圖 16 明，宋珏，〈與沮翁尺牘〉，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取自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官方網站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9006>，檢 索 日 期：2020 年 09 月 15 日。
- 圖 17 明，宋珏，〈觀物之生寫生冊〉自跋，北京保利 2016 年秋拍夜場。取自雅昌藝術網 <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96524036/>，檢 索 日 期：2020 年 09 月 15 日。
- 圖 18 至圖 3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 圖 31 清，康熙帝，〈臨董其昌書李白把酒問月詩〉，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取自郭秀蘭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書法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110。
- 圖 32 明，董其昌，〈行書岳陽樓記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 <https://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7/2188/img0003.xml>，檢索日期：2020 年 09 月 15 日。
- 圖 33 明，董其昌書；董鎬摹勒，《書種堂續帖》。臺南謙受堂藏；許哲瑛、劉冠宏攝。
- 圖 34 至圖 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與之比較的《書種堂續帖》圖版出處見圖 33。
- 圖 39 至圖 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 圖 48 明，董其昌，「冊頁本」〈東城高且長〉段。圖版出處參圖 11。
- 圖 49 至圖 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 圖 60 清，康熙帝，〈行書臨董其昌五絕詩軸〉，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取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冊 15，頁 267。
- 圖 61 清，康熙帝，〈大學刻石〉。取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 65，頁 50-56。
- 圖 62 清，康熙帝，〈御製佩文韻府序〉。取自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數位化公開影像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28501659\\$2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28501659$2i)，檢索日期：2020 年 09 月 15 日。
- 圖 63 至圖 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 圖 66 明，董其昌〈行書岳陽樓記卷〉剪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參圖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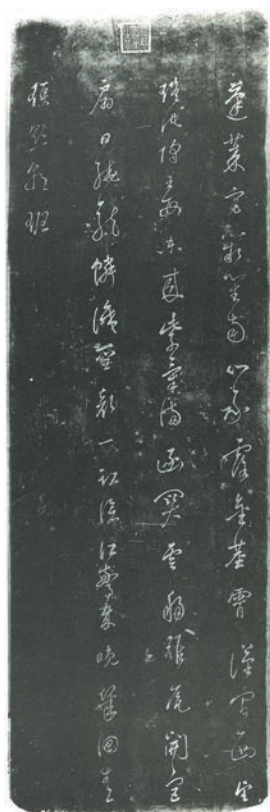


圖 1 康熙帝 杜詩刻石

依康熙御臨董其昌之作上石，清康熙年間（1662-1722）刻，北京圖書館藏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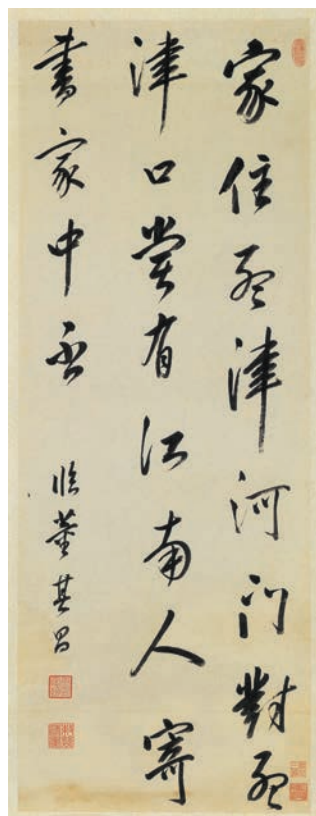


圖 2 聖祖仁皇帝御臨董其昌書王維詩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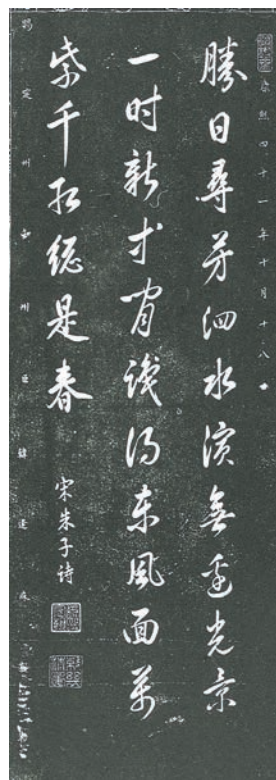


圖 3 康熙「自運」作品中較佳之作

康熙皇帝書；韓蓬麻摹勒〈朱子詩刻〉，康熙四十一年（1702，時康熙帝四十九歲）刻，石在河北定縣，北京圖書館藏拓本



圖 4 康熙「自運」作品中較佳之作

康熙皇帝書；石璠鐫刻〈賜僧傳琬詩刻〉，清康熙年間（1662-1722）刻，石在雲南昆明，北京圖書館藏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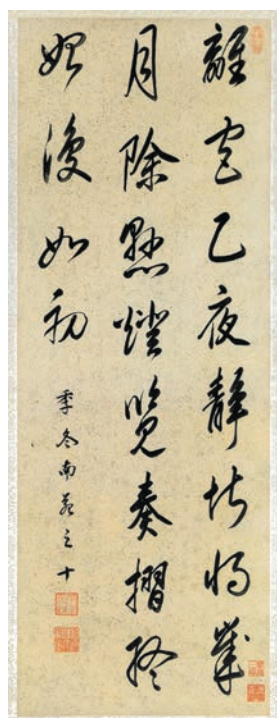


圖 5 聖祖仁皇帝御筆季冬南苑詩（之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筆者認為此作多字字形結構不佳，筆劃轉折劃分出的空間過於均等，且結體莫名拉長。依《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三集）卷四十八，知此詩文本為康熙四十三年（1704，時康熙帝五十一歲）季冬所作，故書法必寫於此後，已非早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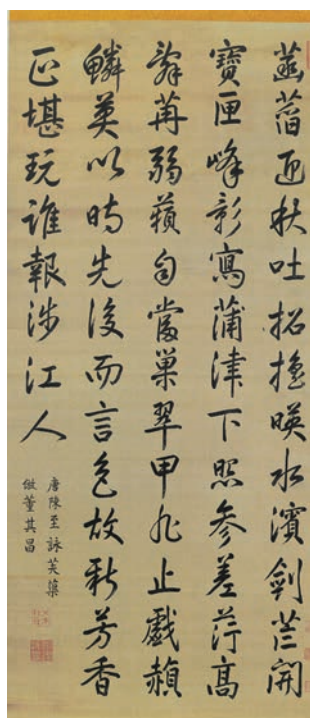


圖 6 聖祖仁皇帝御書陳至詠芙蕖詩軸
倣董其昌書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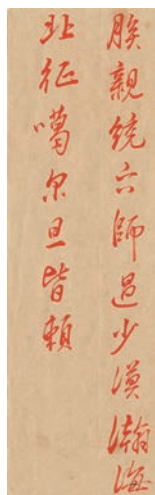


圖 7 康熙硃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
時康熙帝四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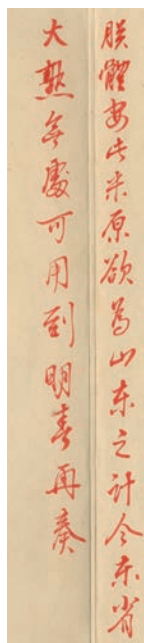


圖 8 康熙硃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
時康熙帝五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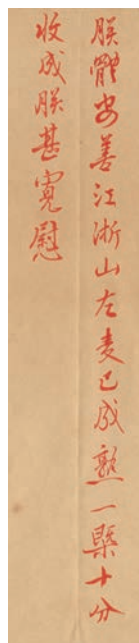


圖 9 康熙硃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
時康熙帝五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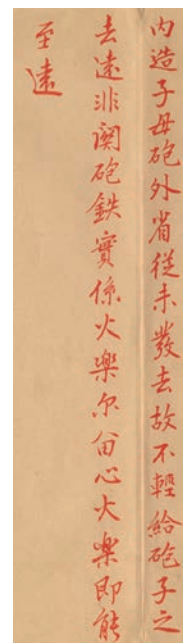


圖 10 康熙硃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於康熙五十年（1711，
時康熙帝五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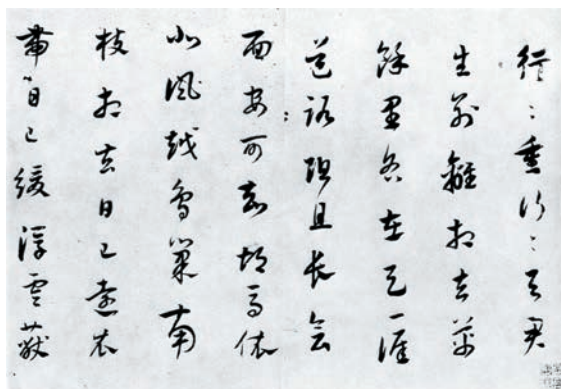


圖 11-1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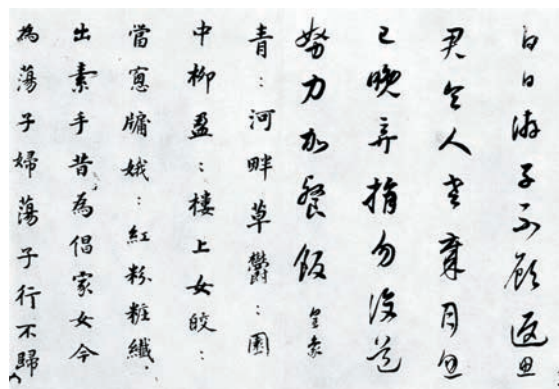


圖 11-2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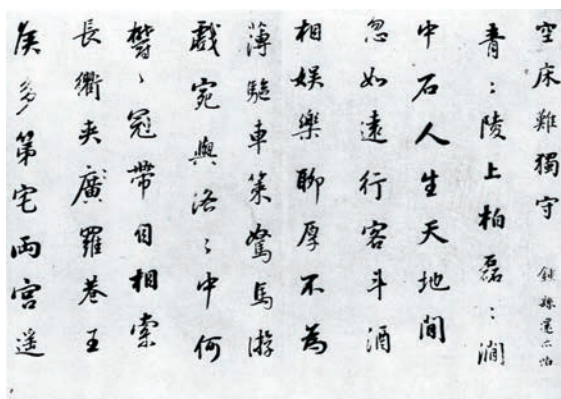


圖 11-3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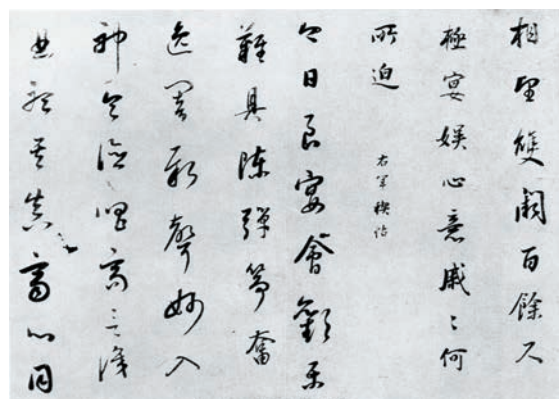


圖 11-4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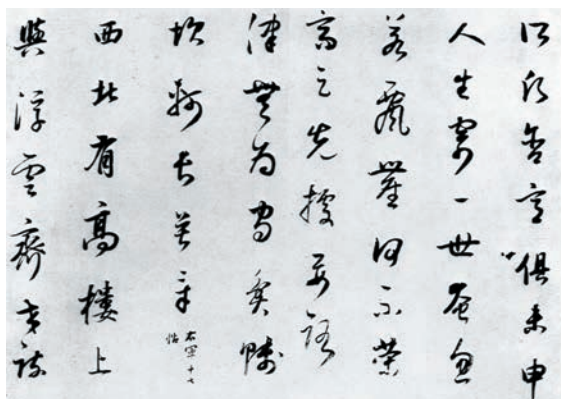


圖 11-5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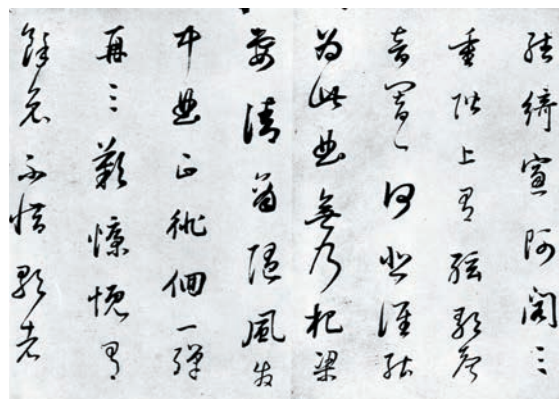


圖 11-6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六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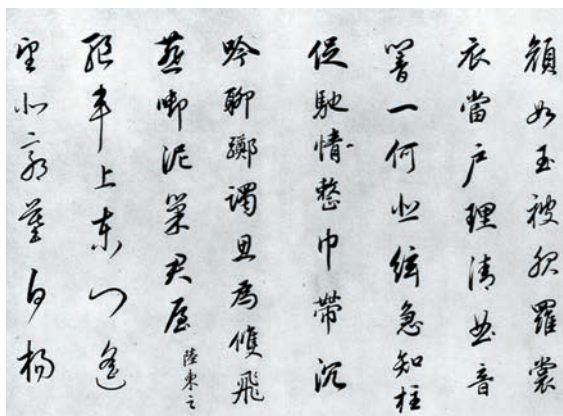


圖 11-13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十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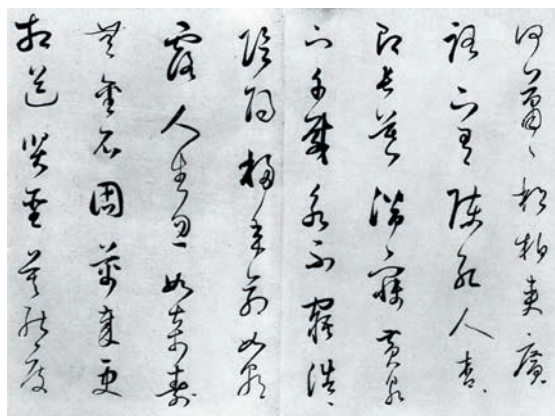


圖 11-14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十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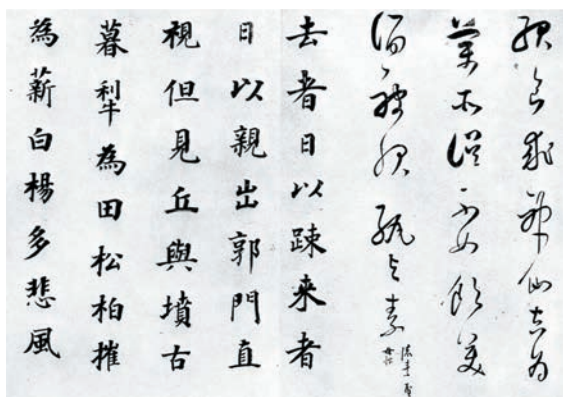


圖 11-15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十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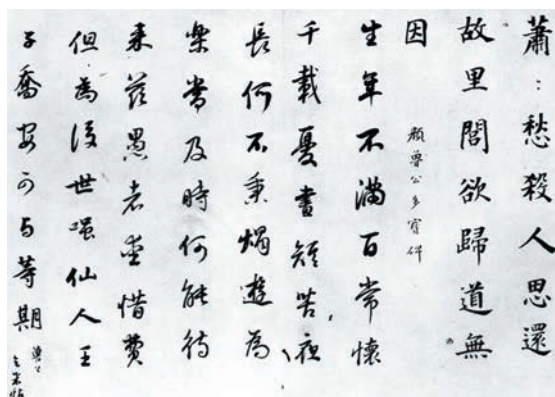


圖 11-16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十六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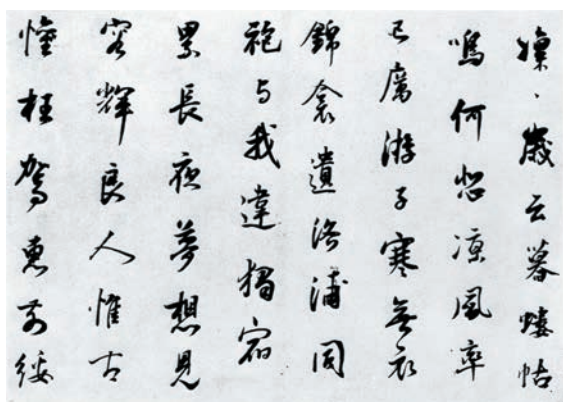


圖 11-17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十七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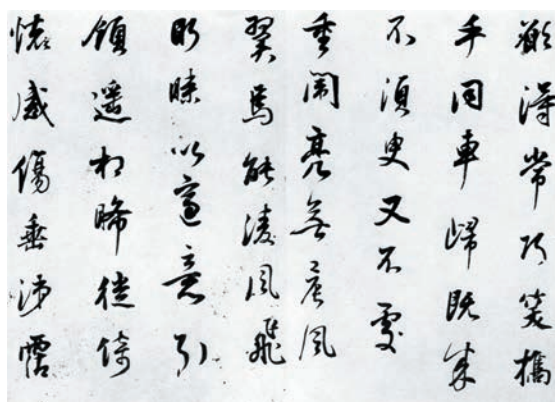


圖 11-18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十八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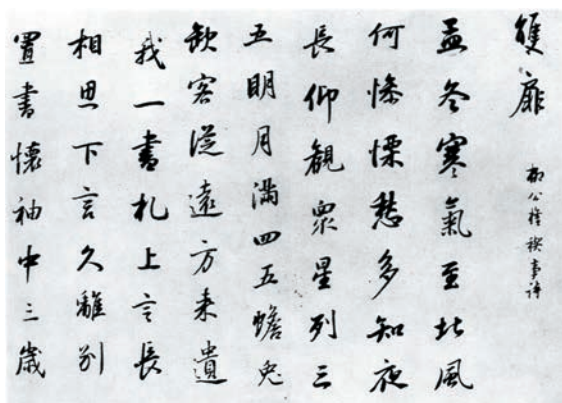


圖 11-19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十九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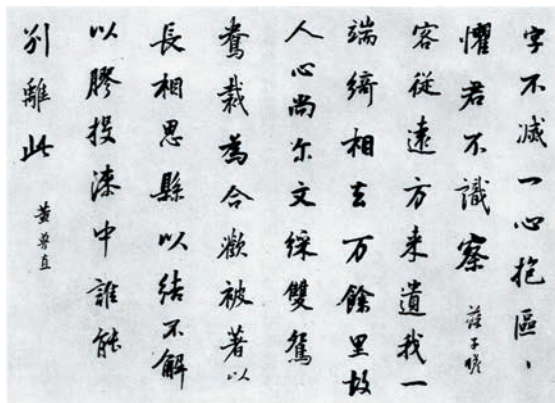


圖 11-20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二十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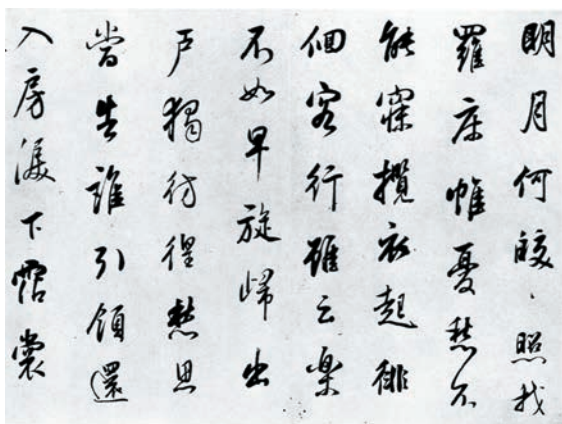


圖 11-21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二十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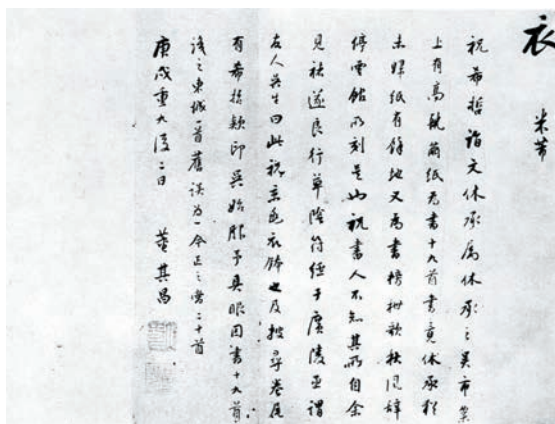


圖 11-22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二十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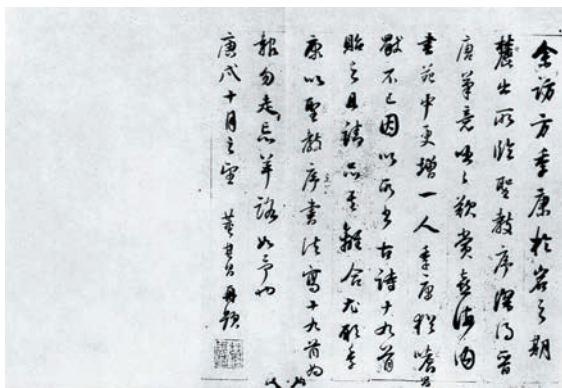


圖 11-23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二十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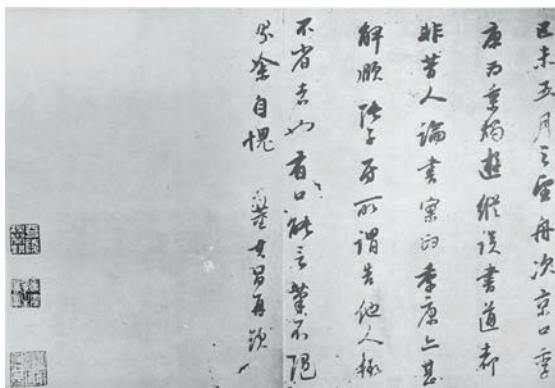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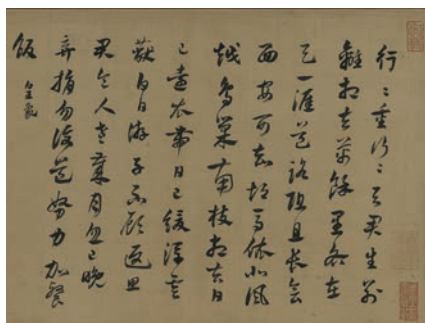


圖 11-24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第二十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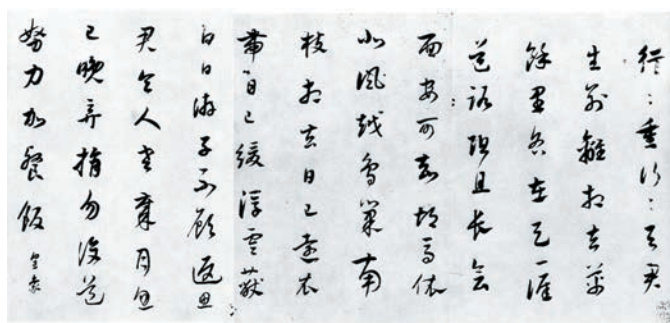
圖 11 董其昌 古詩十九首「冊頁本」 藏地不詳



圖 12 宋珏 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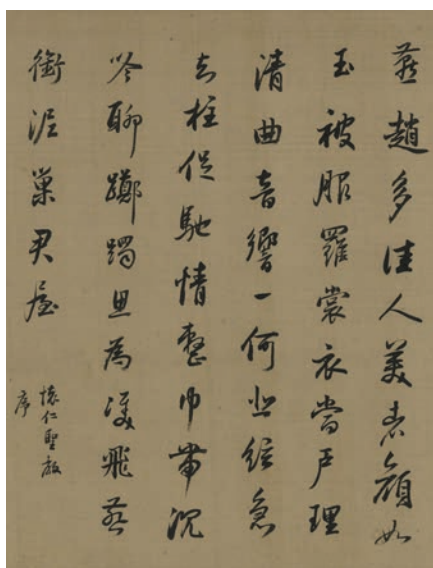


宋珏對皇象筆意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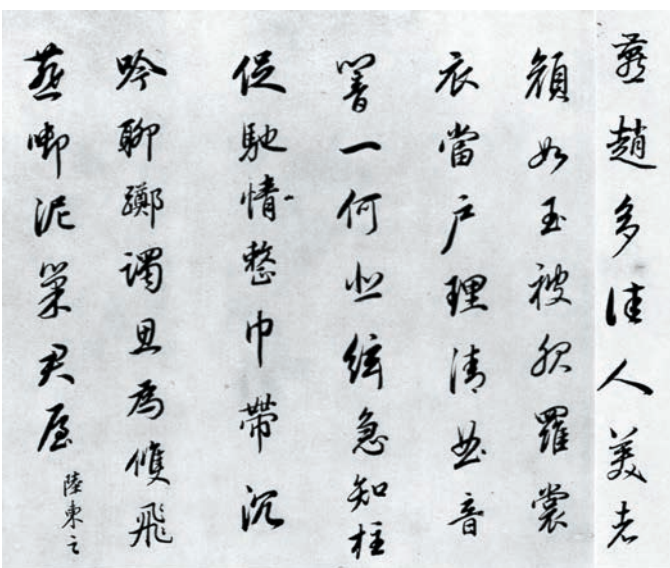


董其昌對皇象筆意的理解

圖 13 上海博物館本〈行行重行行〉中宋珏對皇象筆意的理解，與董其昌「冊頁本」原作比較



宋珏改用懷仁〈集王聖教序〉筆意



董其昌原作用唐代陸柬之筆意

圖 14 上海博物館本〈燕趙多佳人〉對照董其昌「冊頁本」原作同段落



上海博物館藏宋珏〈各體古詩十九首〉



北京故宮藏黃庭堅〈草書諸上座帖〉

圖 15 上海博物館本「周元亮借觀一過」印，與北京故宮藏黃庭堅〈草書諸上座帖〉中同印文之印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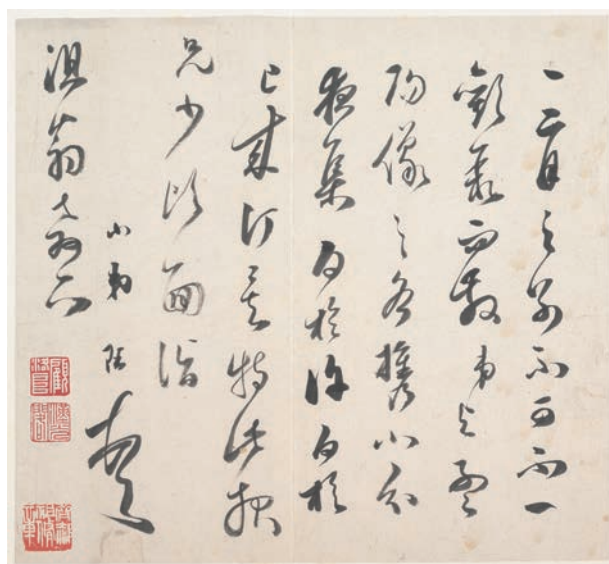


圖 16 宋珏 與沮翁尺牘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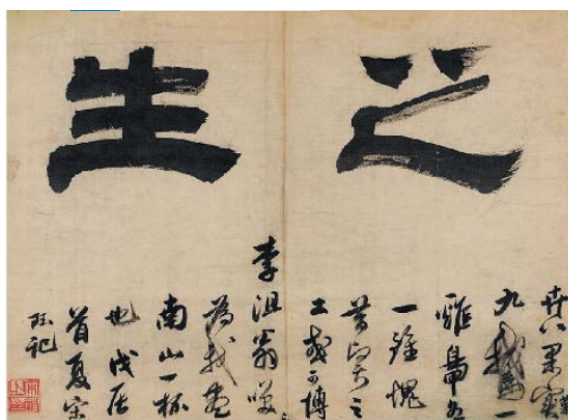


圖 17 宋珏 觀物之生寫生冊自跋 1628 年 北京保利 2016 年秋拍夜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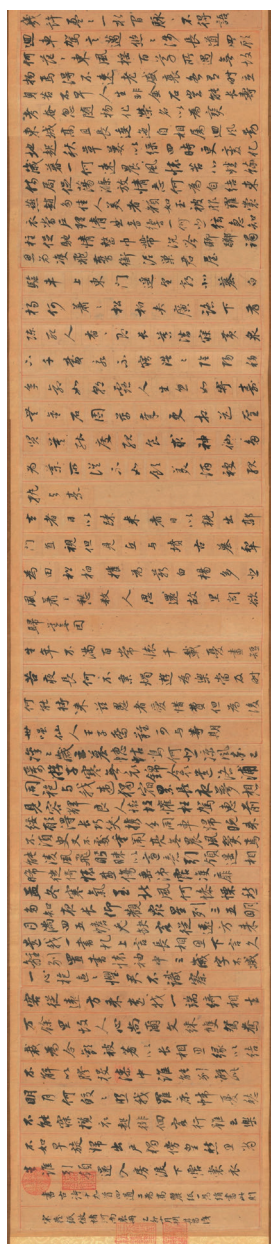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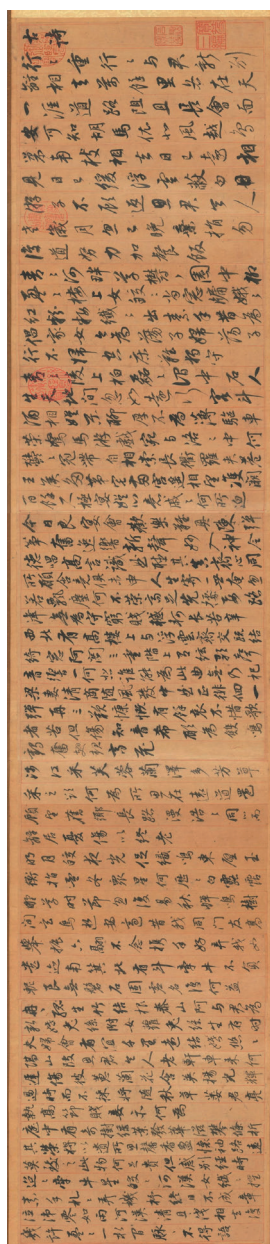


圖 18 明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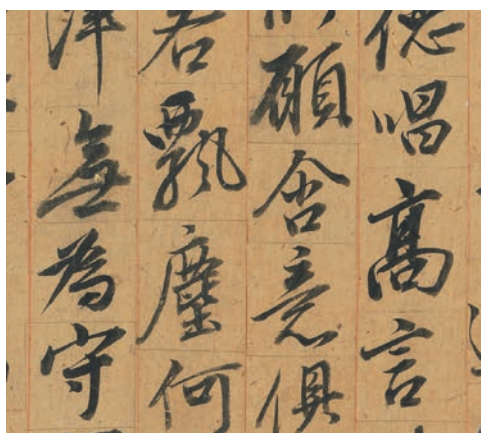


圖 19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
裡字字獨立的單字字塊



圖 20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
裡數字一組的字條



圖 21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字與字
間填補了無字的空白紙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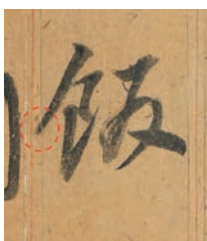
圖 22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可見
僅有朱絲界欄的無字紙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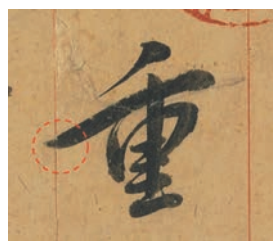
「歡」樂難具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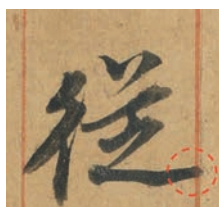
思君令「人」老



努力加餐「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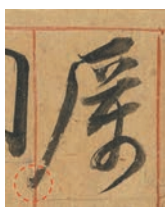
行行「重」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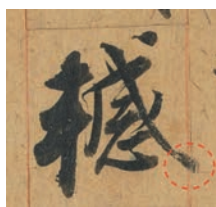
客「從」遠方來



涼「風」率已厲



涼風率已「厲」



「慙」軻長苦辛

圖 23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被裁去筆劃末端並在重裱後補筆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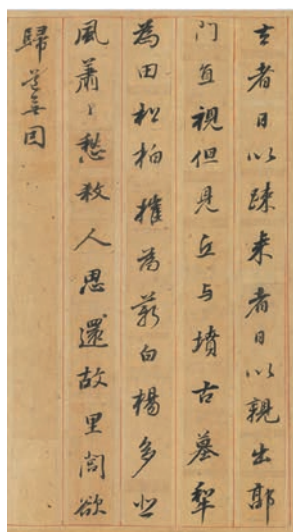


圖 24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裡異常鬆散及異常緊密的字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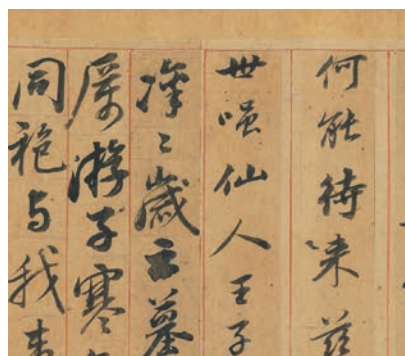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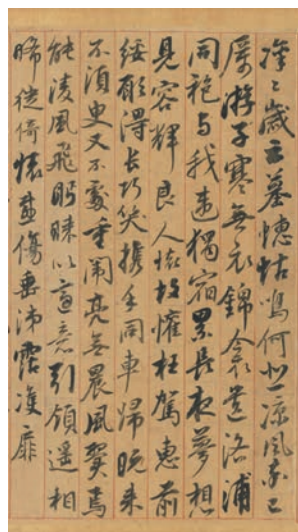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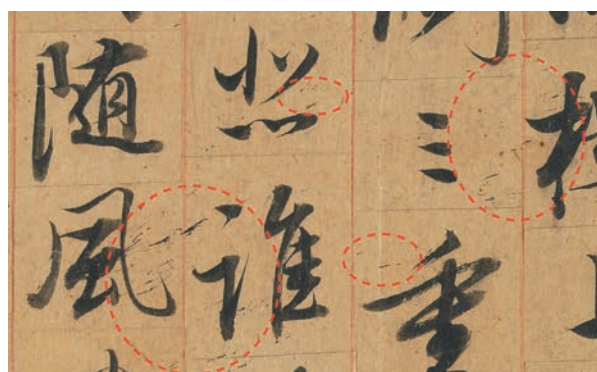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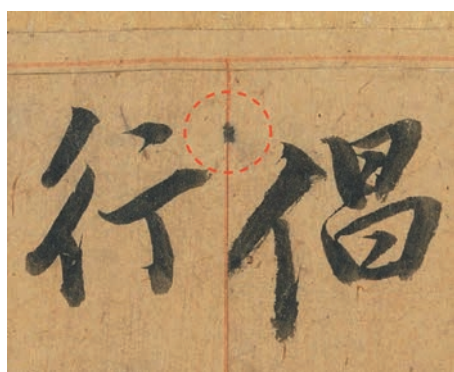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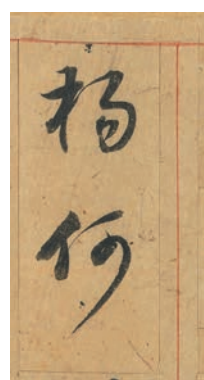
圖 25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各行行寬不一



圖 26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卷面上的墨痕



圖 27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在重裱前留下的墨痕



從「清商『隨風』發」一帶往右上噴濺

圖 28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重裱後才灑上的墨點



圖 29-1 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第一開



圖 29-2 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第二開



圖 29-3 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第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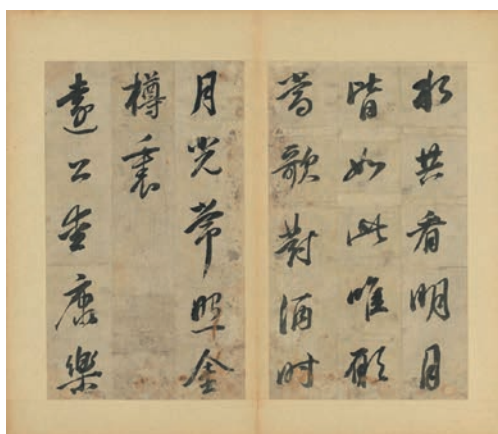


圖 29-4 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第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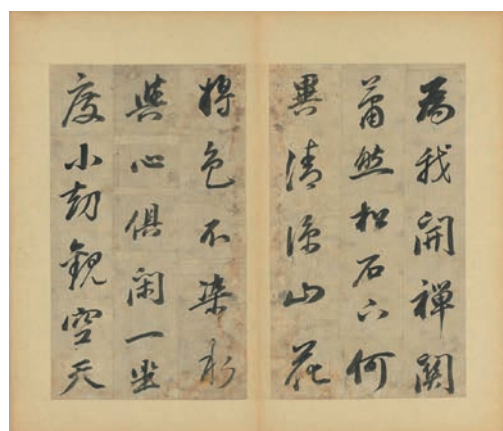


圖 29-5 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第五開



圖 29-6 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第六開

圖 29 明董其昌書李白詩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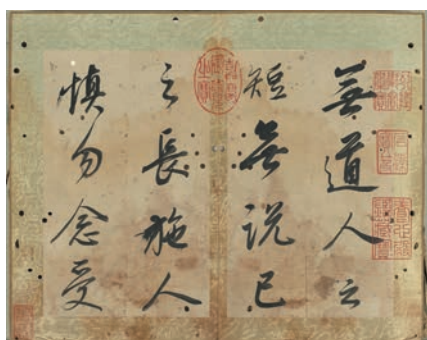


圖 30-1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第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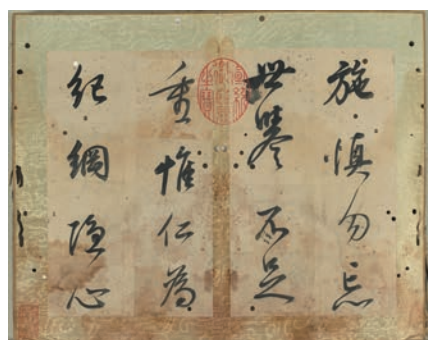


圖 30-2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第二開



圖 30-3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第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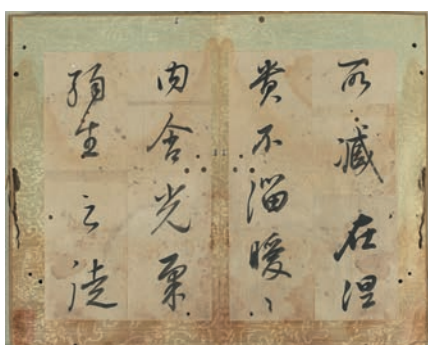


圖 30-4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第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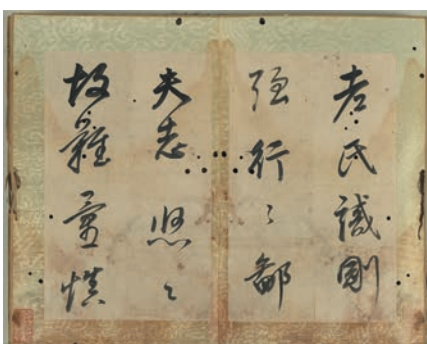


圖 30-5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第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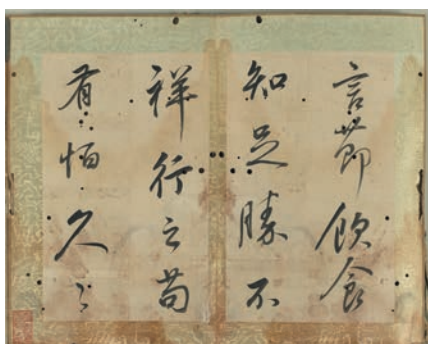


圖 30-6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第六開



圖 30-7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第七開

圖 30 明董其昌書崔瑗座右銘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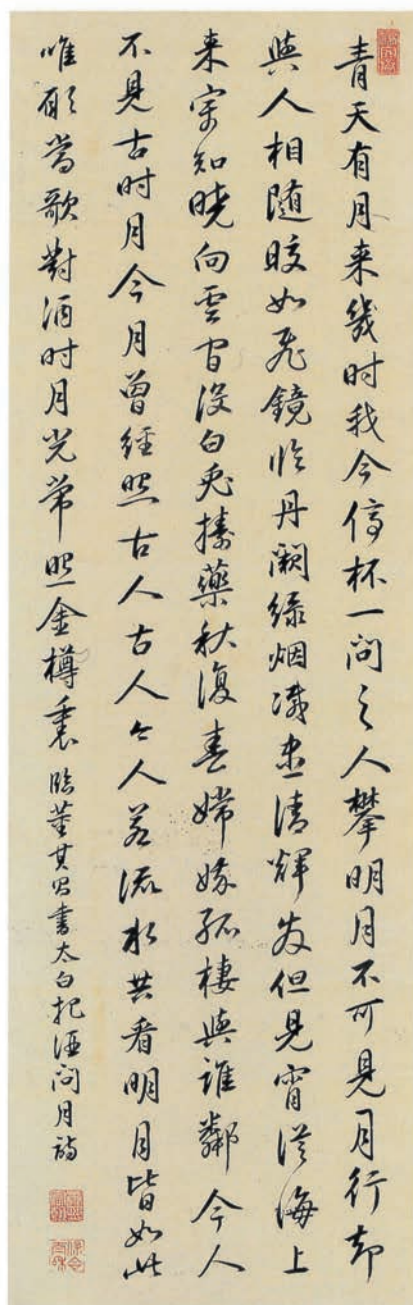


圖 31 康熙帝 臨董其昌書李白把酒問月詩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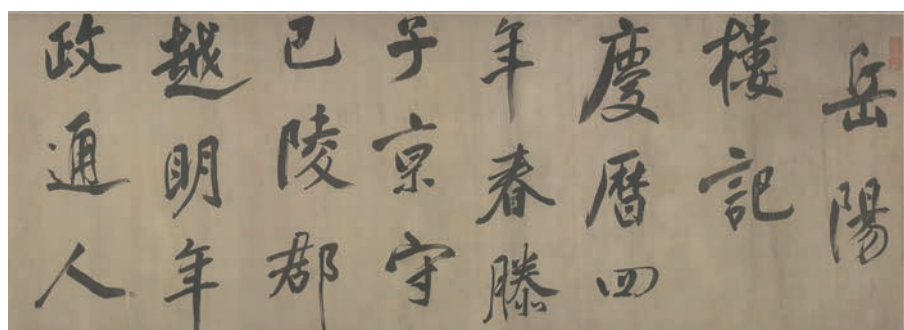


圖 32 董其昌 行書岳陽樓記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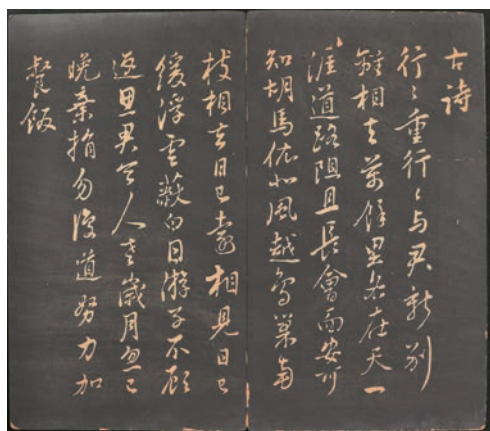


圖 33-1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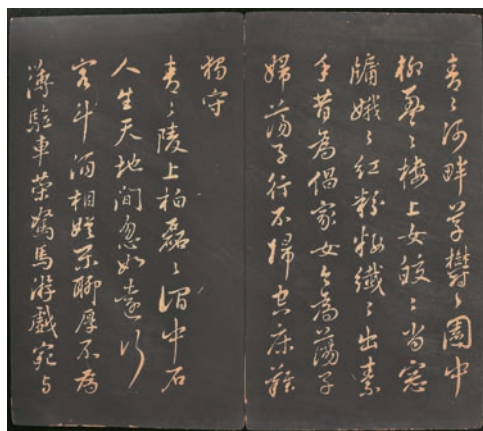


圖 33-2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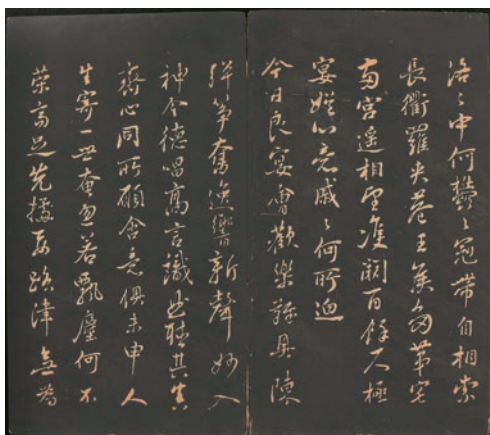


圖 33-3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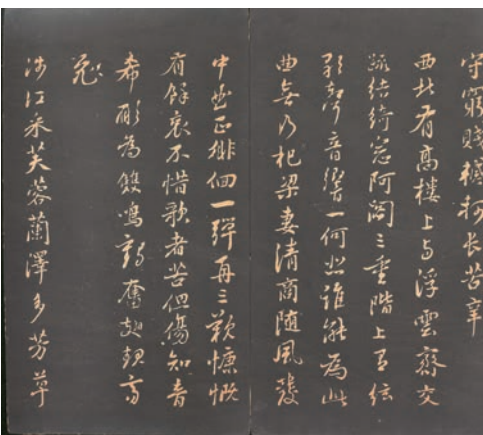


圖 33-4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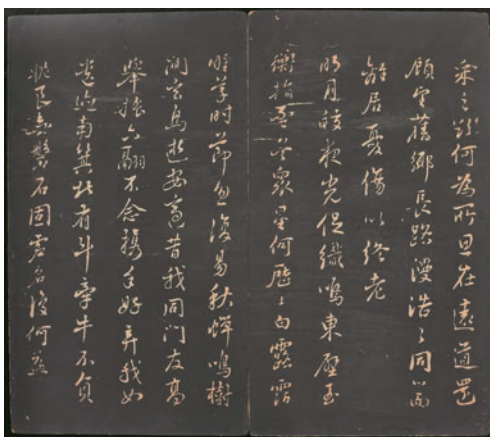


圖 33-5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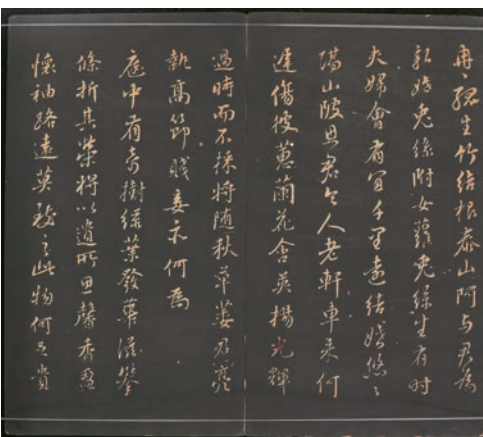


圖 33-6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六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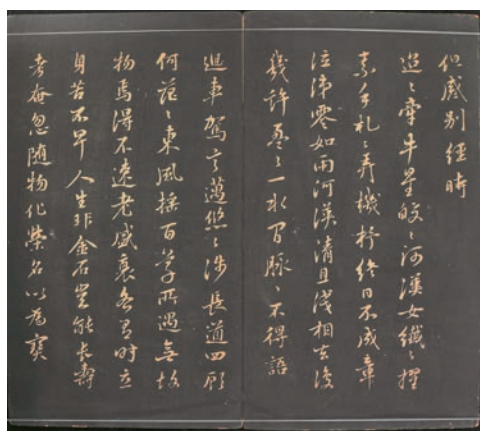


圖 33-7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七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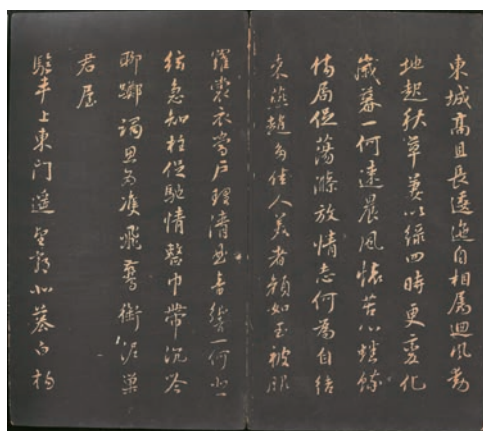


圖 33-8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八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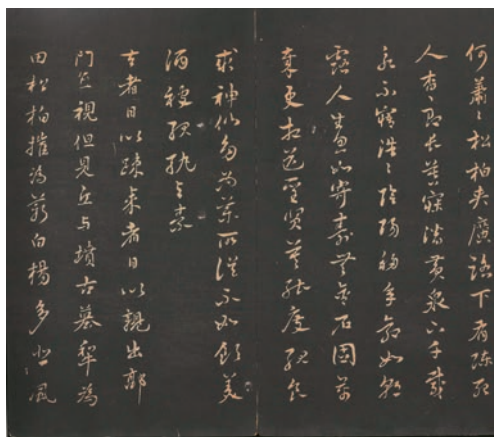


圖 33-9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九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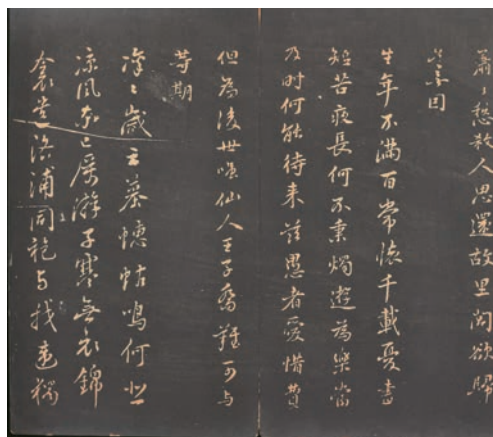


圖 33-10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十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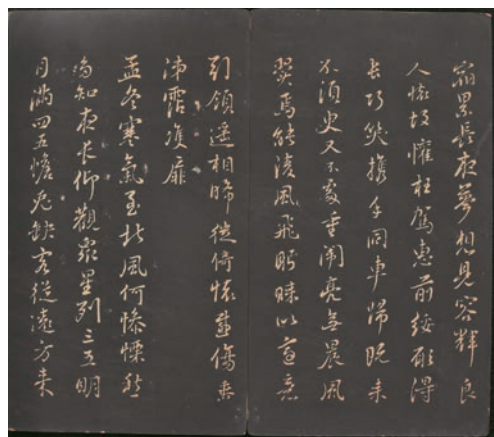


圖 33-11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十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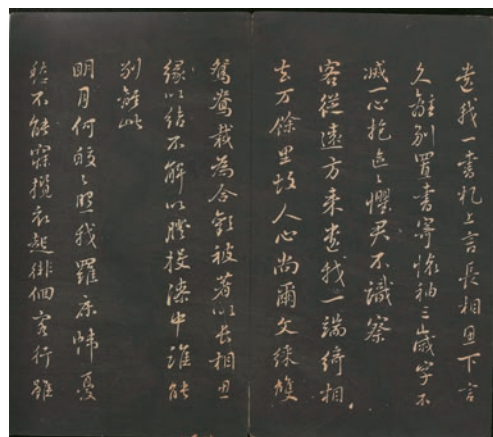


圖 33-12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
相關部份，第十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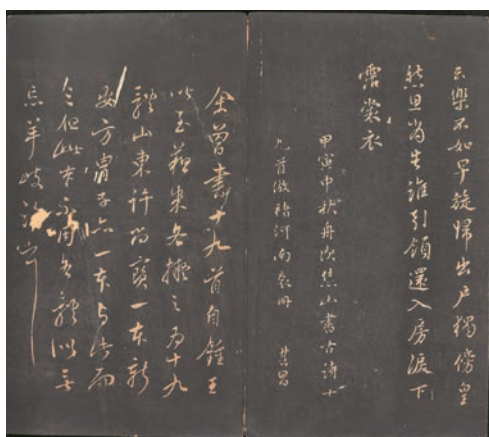


圖 33-13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相關部份，第十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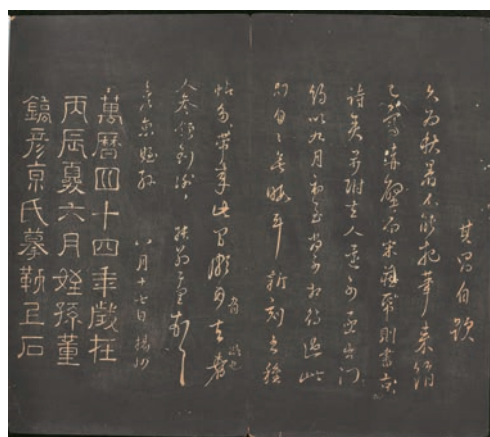


圖 33-14 《書種堂續帖》中的〈古詩十九首〉相關部份，第十四開

圖 33 《書種堂續帖》卷四中的〈古詩十九首〉相關部份 臺南謙受堂藏



圖 34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無往不收」的筆法與《書種堂續帖》比較



圖 35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的連筆與《書種堂續帖》比較



圖 36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的帶筆
與《書種堂續帖》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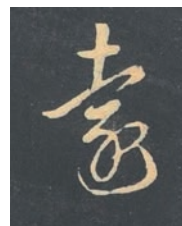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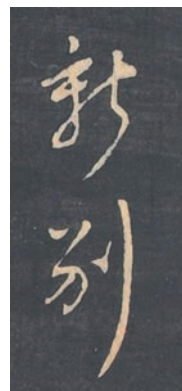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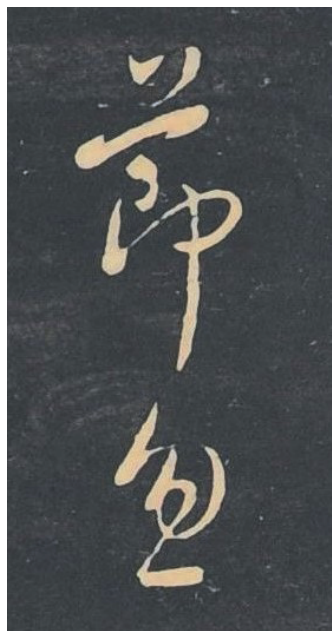


圖 37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的飛白
與《書種堂續帖》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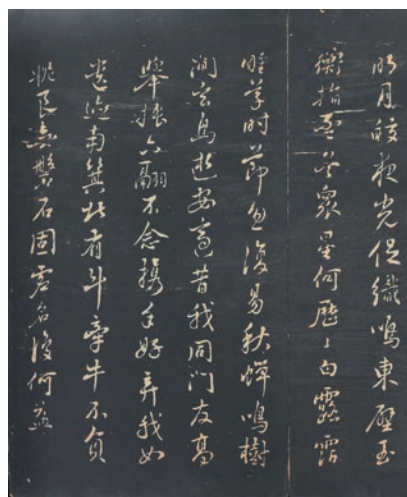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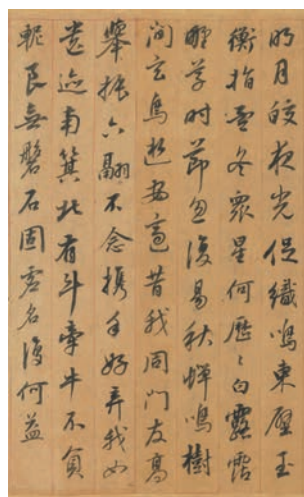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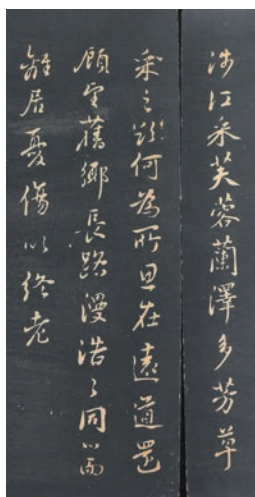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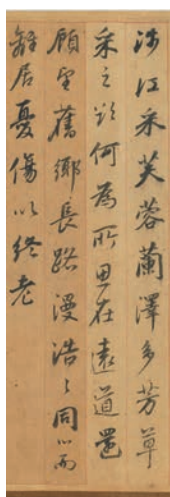


圖 38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與《書種堂續帖》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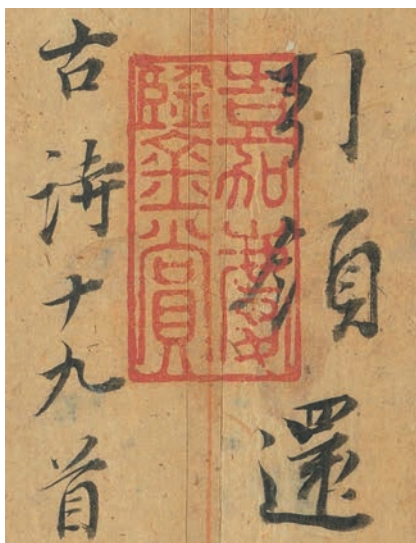


圖 39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的作者董其昌自跋與正文之間的接縫



圖 40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裡斷開的「金粟山藏經紙」印可合而為一



圖 41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卷面透出的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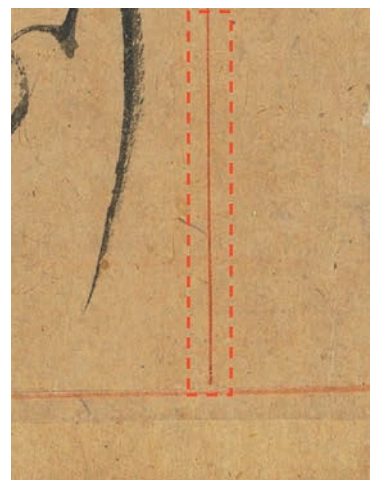


圖 42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標題「古詩」與次行「行行重行行」間未被裁開的界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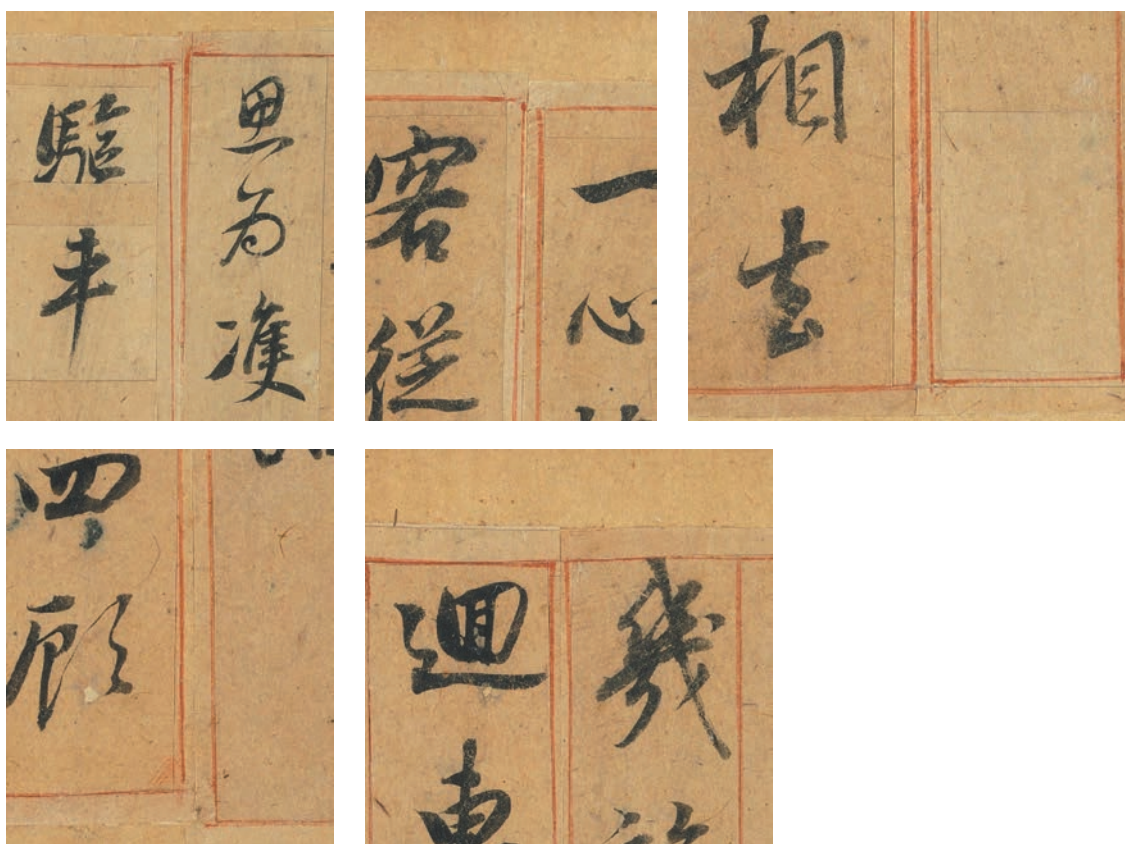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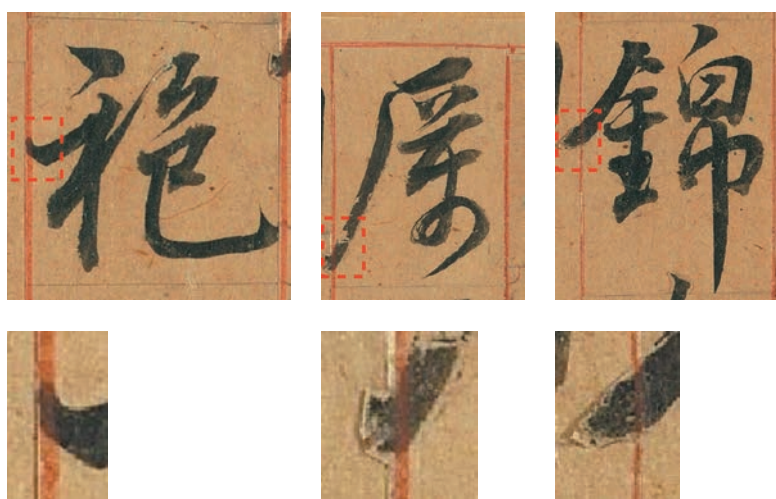


圖 43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各開轉換處殘留至今的雙重界欄與邊框



上圖局部放大

上圖局部放大

上圖局部放大

圖 44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界欄疊壓於字之上



何能「待來」茲 右側

萬歲「更相送」左側

圖 45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
界欄被二次描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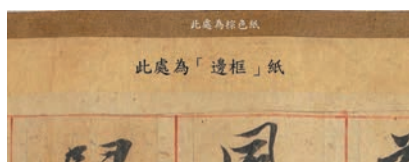


圖 46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
畫心被添補「邊框」



由虛線箭頭所指處可知，棕色紙位置應在裱綾之下

圖 47 故宮本〈古詩十九首〉
卷面最外沿的棕色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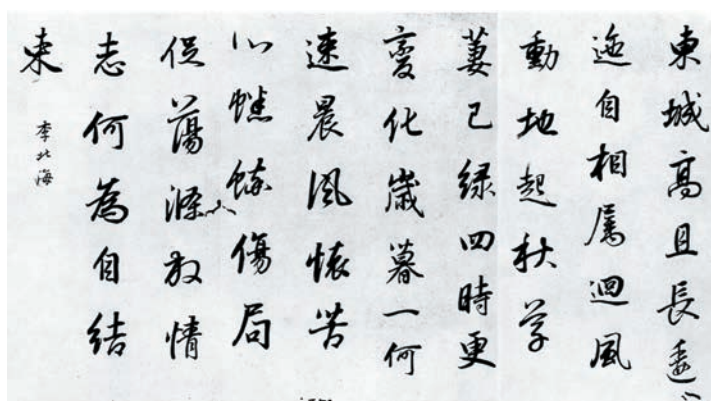


圖 48 董其昌〈古詩十九首〉「冊頁本」中以
李北海筆意書寫的〈東城高且長〉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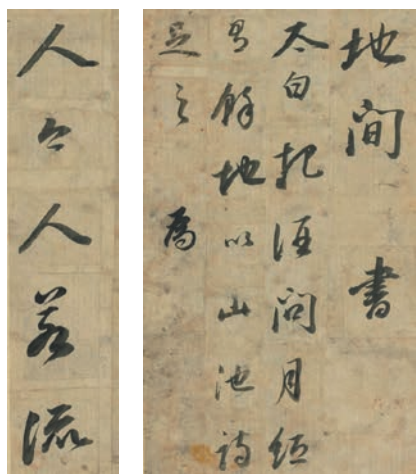


圖 49 故宮本〈李白詩冊〉
章法、行氣怪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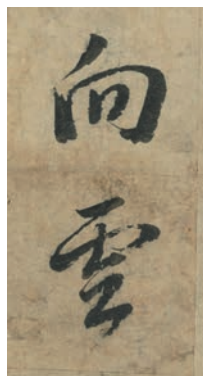


圖 50 故宮本〈李白詩冊〉
相鄰紙色的差異



圖 51 故宮本〈李白詩冊〉上多塊互相重疊的相鄰紙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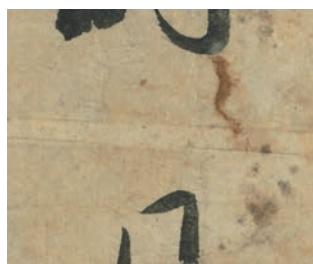
圖 52 故宮本〈李白詩冊〉上多字剝落缺損



墨痕

墨痕

接縫處連續的霉斑



接縫處連續的霉斑



接縫處的斑點、污痕有明顯邊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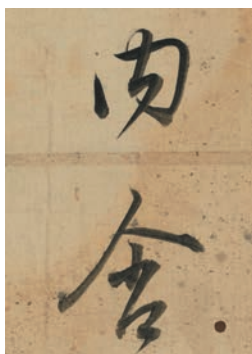


痕跡在接縫處中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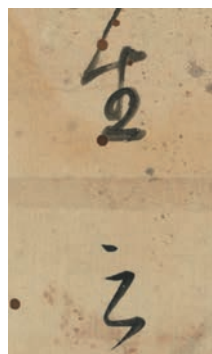
圖 53 故宮本〈李白詩冊〉紙面上的墨痕及髒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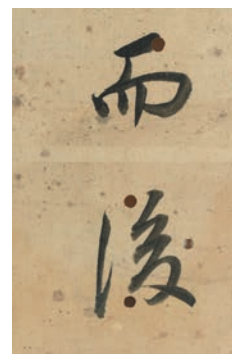
圖 54 故宮本〈李白詩冊〉
「光」字上的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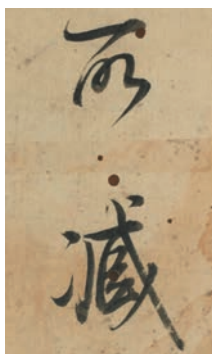
二字間插有空白紙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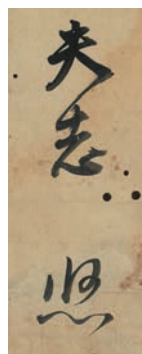
二字間插有空白紙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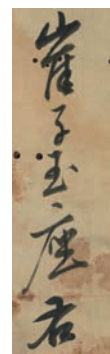
二字間插有空白紙塊



二字間插有空白紙塊



「行行鄙夫志」與
「悠悠故難量」間
插入空白紙塊，導
致行氣完全斷開



字與字之間過於
貼近，行氣怪異

圖 55 故宮本〈崔瑗座右銘〉錯置的空白紙塊與不自然的行氣



圖 56 故宮本〈崔瑗座右銘〉上的墨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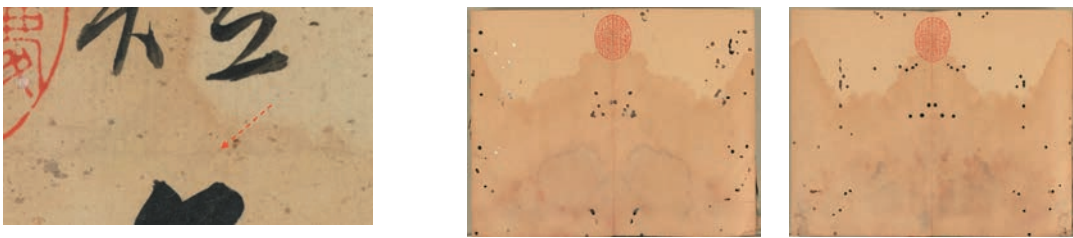


圖 58 故宮本〈崔瑗座右銘〉A1、B1 開副葉上的巨大褐色「山形髒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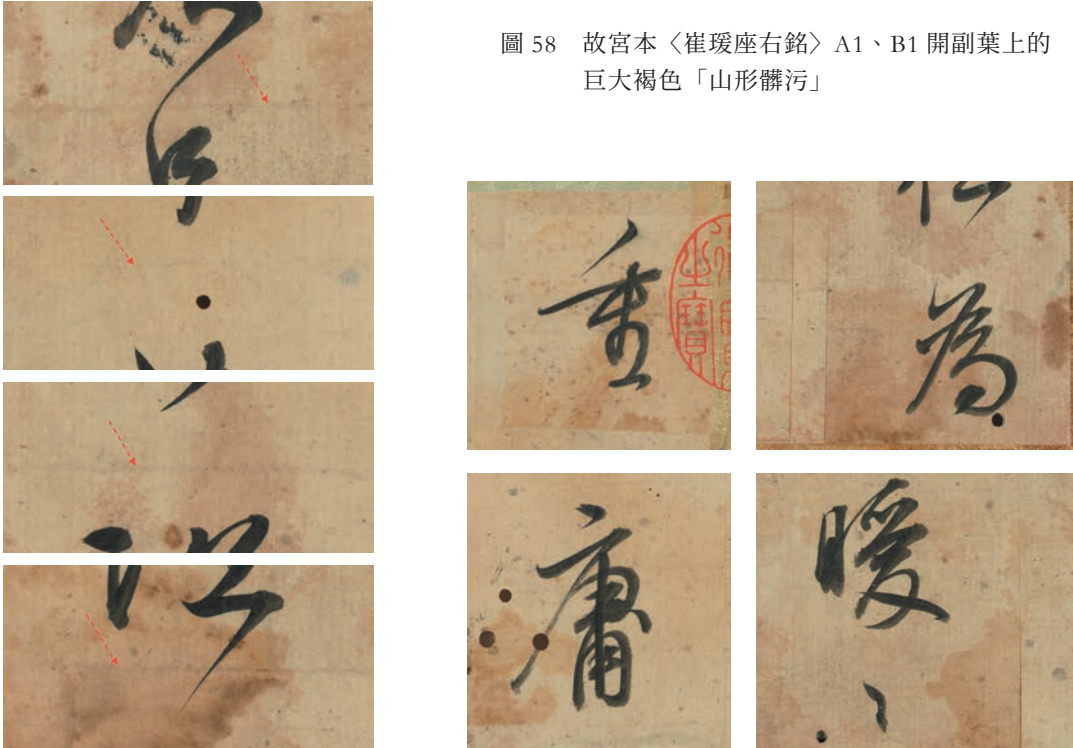


圖 57 故宮本〈崔瑗座右銘〉上的細摺痕（圖上虛線箭頭指出處）

圖 59 故宮本〈崔瑗座右銘〉上邊稜明顯的不連續污漬、霉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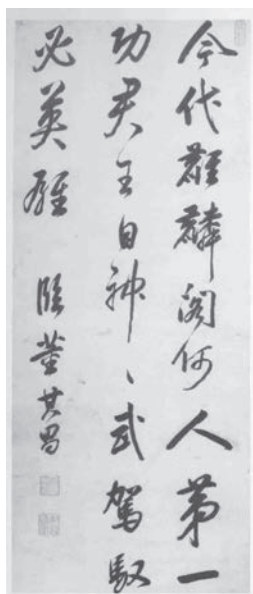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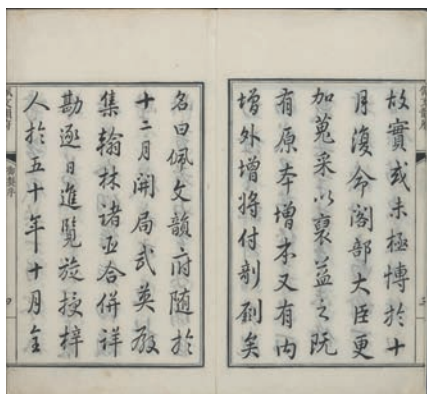


圖 60 康熙帝
行書臨董其昌五絕詩軸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書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時康熙帝四十一歲），原石在北京東城區國子監，此圖為北京圖書館所藏拓本

圖 61 康熙帝 大學刻石 節選



康熙五十年（1711，時康熙帝五十八歲）十月書

圖 62 康熙帝〈御製佩文韻府序〉中的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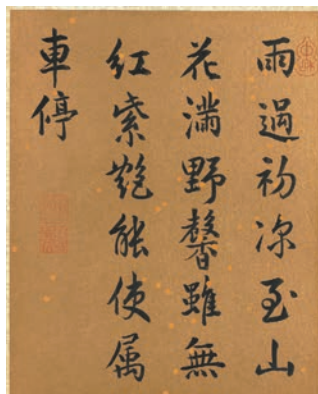


圖 63 康熙御題〈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
第四開野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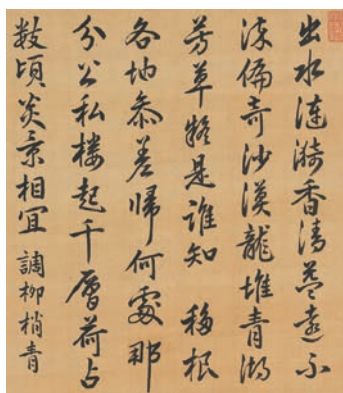


圖 64 康熙御題〈蔣廷錫瓶蓮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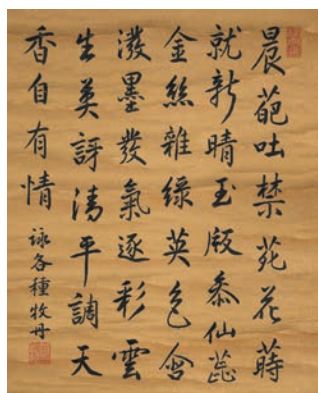


圖 65 康熙御題〈蔣廷錫畫牡丹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6 董其昌〈行書岳陽樓記卷〉中源自米芾的筆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